

## 编者前言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于北京，1980年12月被迫停刊，共出刊9期并编印《文学资料》3本；1990年5月，《今天》于挪威奥斯陆复刊，作为海外编辑出版的季刊文学刊物，共出刊91期，如此创刊、被迫停刊、再创刊，前后历时近35年。

至本期，正好是刊物的第100期，编辑部为此专门编辑了一个专号，以一组文章和一个资料选辑作为纪念。

回顾这100期的历史，有一个事情要强调：1990年复刊时候，《今天》不顾自己“孤悬海外”的困境，竟坚持自己仍然是一份中国文学刊物，并且和老《今天》一样，要在这充满危机的时代继续推动文学的变革和发展。可是，这个抱负和它的实际处境完全不相称，而由此带来的种种艰难，让这刊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多少次面临夭折。实际上，复刊后的《今天》连一个编辑部都没有，担任编辑的诸人漂泊于世界各地，彼此联系只有写信、电话、传真三途（电脑网络的方便是后来的事）；至于作者，更是远在天边，每一期的稿件只能如一群群不知疲倦的鸥鸟，凌乱地在大洋之间艰难旅行，何况资金、印刷、出版、发行等方面，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拿到本期这个纪念专号的读者，可以读一读陈迈平、林道群、宋琳、陈东东写的几篇回忆文字，其中钩沉出的很多人和事，让现在的人看来会觉得很不现实，甚至有点超现实，例如，诗歌编辑张枣每次给编辑部寄出诗歌稿件的时候，都要精心绕着诗行字句裁掉空白纸张，只保留存有诗行的一片小纸，以减轻邮件重量，省下邮资。

非常遗憾的是，还有一些重要的编辑部成员，没有能在本期留下他们的记忆，这不仅前后分别担任过社长、主编和编辑部主任的北岛、谭嘉、欧阳江河、顾晓阳，还有前后做过编辑的徐晓、阿城、黄子平、查建英、南方（张亮）、赵毅衡、翟永明，以及近年加入编辑工作的鲍昆、李云雷。不过，即使他们的回忆没有进入到这100期的纪念之中，读者仍然可以在本期的很多文字中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身影会永远铭记在《今天》的历史之中。

从老《今天》开始，诗歌就是《今天》最响亮的旋律，复刊后的《今天》，依然是几代诗人共同拥有的诗歌广场，这里也依然是诗的最强音，然而，长期担任诗歌编辑的诗人张枣于2010年3月离开了尘世，此刻不能和大家一起回顾以往。但是诗人没有离开我们，只要拿起刊物，我们会在每一页里都听到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的声音。这第100期专号，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对张枣的一个特别的纪念。

读本期的回忆文章，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感动，同时也许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么千辛万苦办一份文学刊物，值得吗？既然流亡海外，何不老老实实办一个流亡刊物，为什么还不能忘情中国文学？在海外坚持办刊这么多年，《今天》究竟要干什么？如果它的确有自己的文学追求，这追求有意义吗？这追求实现了吗？等等。这些疑问并不容易回答，不过本期发表的很多文字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回答，尽管回答得不很充分。如果再做些补充，我们还想说这样几句话：一个文学刊物如果没有自己特定的追求，没有自己特殊的使命感，办它干什么？问题是，面对当代世界的巨大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大家习惯的旧的社会和文学环境正由此

在迅速崩塌——一个文学刊物越是有自己的追求，就不能不越要适应变化，一边警惕地观察这巨变中的现实，一边经常反省自己，并且迅速作出调整。回顾起来，《今天》也正是这样做的，本期的多篇回忆文章和“编者按和前言小集”，可以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些调整。或许，《今天》的目标和使命并没有完全实现，刊物的整体水平也不如人意，但刊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变，不但写作倾向、编辑风格，而且编辑队伍、作者队伍也都不断在变，这已经成了复刊后《今天》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它不仅使得刊物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先锋性，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更新和扩展了文学先锋性的概念，使这个多少已经变得空洞和迟钝、越来越被冷落的概念，获得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

我们还向读者推荐本期刊发的“编者按和前言小集”，这个“小集”，是从过去刊物做过的各种专辑的“编者按语”、“前言”、“后记”中选辑出来的，共二十一篇。现在看这小集的文字，一个显著特点是刊物编辑视野的宽阔，除了多个诗歌、小说和散文的专辑之外，星星画展、摇滚音乐、新纪录片运动、香港文化、后殖民理论、新媒体研究都有专设，其中仅电影，就分别为华语电影、香港电影和国内的“独立电影”做了三个专辑。实际上，如果加上这些年来所做其他专辑和各类专栏（总数约五六十种，几乎每两期刊物就有一个），《今天》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文学艺术领域，近二十多年出现的重要新现象、新苗头差不多都有涉及，这在其他文学刊物，恐怕是很少有的。一个文学刊物，为什么对文学以外的东西这么注意？这当然是有意为之。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化的多元发展正在形成全新的格局，文学写作的环境已经不如过去“纯粹”，不但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交融已经成为趋势，而且文学写作和非文学写作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今天》编辑的多元方针，可以说是对这种形势的一个积极的主动反应。今后，我们还会为此做出更多的探索。

这个“编者按和前言小集”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专辑的编辑者，很多都不是《今天》编辑部的成员，而是编辑部专门请的“编外”编辑。考虑到《今天》其实至今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编辑部，多年来所谓编辑部成员大多都是义工，这里说“编外”编辑实际上有点不对劲——谁又是编内编辑？不过，这正反映了老《今天》和复刊后《今天》的一贯特色，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民间刊物。既是民间刊物，刊物的很多编辑者都来自民间，这自然是顺理成章，以本期这个“小集”来说，叶辉、朱朱、黄石、吕新雨、刘辉、齐简、颜峻、雷立刚诸位，都是“编外”编辑，其中齐简是位律师，颜峻是音乐制作人和批评家，雷立刚是青年网络作家，他组织的小说专辑全部来自网络上的写作。我们这里强调这些，是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有志于文学艺术创作，或者愿意在文学中探索和追求理想的文学爱好者，更多的来关心《今天》，并且以各种方式加入《今天》，也只有这样，这个刊物才能永远年轻。

历经三十余年，刊物也出了整100期，但是我们觉得《今天》还年轻，只要我们的根永远扎在民间，相信它还会继续年轻。

## 聚散离合，都已成流水落花

——追记《今天》海外复刊初期的几次编委会议

万之（曾任《今天》编辑、社长）

《今天》坚持到了今天，能出满一百期，实在不容易。

这是很多人料想不到的。

我在1992年《今天》海外版出满两年八期时的编后语中曾介绍过，有一位号称深谙姓名学的大师，预言《今天》活不长久，因为名字就没取好。他说，“今天”二字都是四划，“四”与“死”谐音，两个四划，两个“死”音，表明这份杂志必死两回无疑。《今天》在国内已经死了一回，那海外肯定还得死一回。而且，即使能勉强活着，人气也不会很旺，因为“今天”这两个字里，“今”里只包含了一人，“天”字也就是二人，所以永远就是一二个人的事业，不成大气候。

这位大师的预言我不必当真，但《今天》生存的艰难我深有体会。不论是国内草创，还是海外复刊，《今天》的资源一直非常有限，既缺钱又缺人又缺稿，出版条件和环境都不理想。在国内时是靠手工作坊式操作，最初还是钢板刻蜡纸制版，手摇滚筒油印自己装订，后来好歹还有蜡纸打字。海外复刊一开始也是我自己用电脑打字排版，整本复刊号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后来移到香港排版印刷，甚至得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成为比较专业的出版，植字排版规范，装帧精美纸质高雅，但是发行上一直比较困难，过期杂志堆满仓库没人要也难以处理。

一份杂志自然如人的生命一样，有开始就必然有终结。但当初我也料想不到《今天》能延续出版如此长久。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就是靠了一二人而重生，而延续，而坚持。如果没有这一二人坚持至今的奉献努力，是维持不下来的。这一二人中首先是主编北岛，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我曾把他形容为一个蜘蛛，假如没有他的努力编织，围绕《今天》的这张人际网络就不可能存在，这个蜘蛛的中心位置任何人没法取代。其次是林道群，后来帮助《今天》在香港的出版印刷发行，都是他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像一头辕马拉动着《今天》这驾三套车艰难前进。

说来惭愧，在《今天》漫长而艰难的路途上，我其实是半途退缩者。其中自然有些客观的原因，倒不是惧怕路途遥远，而是像沙漠旅行，突然找不到了方向。但更主要的还是我自身的原因，有些身心疲惫，也自知能力有限，不堪大任。《今天》本来不设什么社长，也不需要社长，那年因为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要签出版合同，我是代表《今天》签字需要这个身份，才冒充了。而对于带着“长”的职务，我向来总是退避三舍，无奈当上了，自然也要尽早卸任，不敢尸位素餐。我后来无奈中还当过什么笔会的秘书长，也是自己辞退的。我做事往往有始而无终，可能也是个性缺陷。这一生做了些事情，教过书、搞过学术研究、写过小说、翻译过作品、办过刊物、管理过笔会，都未能坚持到底。唯一坚持到底的只有对文学的兴趣，这一生都不会改变。

最近我读到瑞典出版的世界文学史，意外发现其中介绍当代中国文学部分就提到了《今天》，也是所提到唯一一部中文文学杂志。毫无疑问，《今天》已经载入了史册，它当然是当代中文文学最重要的杂志之一。翻开这百期的《今天》目录，你能发现当代中文文学重要作家和诗人的名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今天》已经有了这么漫长的历史，在这段路途上同行过的，当然不止一二人。旧人退出，新人加入，也是杂志能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先后有很多人参与过《今天》的事业，有些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有如走马灯一般。有的人参与时间长一点，甚至数年，而有的人只是匆匆过客，昙花一现。每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有的可能不那么重要，对《今天》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但在回忆《今天》这段漫长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值得记上一笔。

追忆和《今天》先后同仁相识相聚或分手的过程，让我自然回想到《今天》海外复刊后早期的几次编务会议。《今天》同仁分散世界各地，见面相聚很不容易，很多人我都是在会议上才见过一两面，所以这些会议让我难忘。无论怎样聚散离合，如今也都已成流水落花。但闭目倾听，水声还在，落花也会重现脑际。

## 奥斯陆 — 斯德哥尔摩

《今天》在海外复刊的漫长道路的起点是挪威首都奥斯陆。复刊后的第一次编委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为什么起点会在这个偏僻的北欧角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汉学家杜博妮。提到《今天》的历史，也应该为她记上一笔。

杜博妮的人生经历颇有传奇性，她出身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经当过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而她本人则是澳大利亚共青团的领袖，上世纪五十年代她被澳共派到中国学习中文，还是澳共驻华代表，从此和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六十年代她也参加过西方的嬉皮士运动，也经历过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幻灭的过程。而这位聪明的女性后来成为文质彬彬的学者，获得悉尼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担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她研究马克思文艺理论对中国之影响的专著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教科书。1980年，她成为北京外文局聘请的专家，任务是翻译鲁迅、巴金、老舍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但杜博妮不甘当御用翻译，而对当时北京的地下文学更感兴趣，正是她第一个把北岛和《今天》其他诗人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了西方，北岛第一本英文诗集就是她翻译并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太阳城札记》。我和她认识，也是北岛介绍我去帮助她做些翻译中的校对工作。

正因为杜博妮向西方介绍了《今天》，才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后来到北京时也想找这批朦胧诗人，北岛、顾城和我都是在杜博妮的北京住宅里第一次见到马悦然的。所以说，将《今天》推向世界，杜博妮功不可没。

杜博妮喜欢标新立异，因此也是最早向西方大力推荐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汉学家，是她首先将《黄土地》翻译成了英文发表，所以她和陈凯歌也非常熟悉。北岛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写过，那段时间他和我以及陈凯歌经常聚集杜博妮家跟她学习英文，她实际上成了我们的私人英文老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跟她读英国诗人威廉·布拉克的著名诗作《老虎》。

杜博妮的丈夫也是瑞典汉学家，汉学名韩安德，有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有关清末的贱民。老韩知识渊博，说话风趣，很会品茶品酒。他们夫妇在北京的住宅因此也有其他瑞典汉学家和外交官常来常往，我当时结识这批瑞典汉学家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后来我也会定居瑞典，这缘分恐怕也是命中注定。

1984年杜博妮获聘挪威奥斯陆大学东亚系主任的职务。而我1985年中央戏剧学院硕士毕业留校后，1986年能获得挪威奖学金前往奥斯陆大学戏剧系继续攻读博士，研究我崇仰的易卜生，也是因为她的大力帮助。当然，她也希望身边有个能协助她继续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助手，我后来就和她合作翻译过北岛诗选《旧雪》以及王安忆的小说，也对她翻译阿城等提供帮助。

1987年，杜博妮策划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项目，我也参与了。我们申请到一笔挪威国家学术研究基金，可以在两年半即五个学期内邀请五位中国大陆的作家或学者或艺术家来奥斯陆大学客座讲课，分别介绍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戏剧、诗歌、美术和电影，每个人都要留下讲稿，以后就可以成书出版。第一个题目是文学理论，请来了当时的文坛黑马、现在已是声名显赫的刘晓波，这个人选凸显了杜博妮自己喜欢标新立异的特色。所以，刘晓波1988年第一次出国其实就是到挪威，而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他接待过他，因为我经常要给他当翻译等等。本来他应该住半年，讲满一个学期，但因为课讲得不太成功而半途中止，他只住了三个月就提前离开了。其后讲当代美术的是一位叫米丘的艺术家，也是标新立异者，如今标新标到了什么地方我已经不知道了。我自己负责讲了一个学期的当代戏剧，那个时候就介绍过高行健的剧作如《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等等。

1989年秋季那个学期，是北岛来讲当代诗歌。北欧的秋季短暂而紧接着就是黑暗寒冷漫长的严冬，对远离家人独自在外流亡的北岛是一种心理的考验。北岛曾经在他的散文里描写过在北欧这段孤独的生活，也在诗作里写他如何对着镜子说中文。他在奥斯陆的那段日子，几乎每夜都提着几筒啤酒到我这里来，两人对坐饮酒寻找话题，直到我自己的话题全都说完再也无话可说，北岛写道，“迈平得了失语症”。而北岛经常的话题就是要恢复出版《今天》，这个被扼杀在北京胡同里的文学杂志那时好像是冰箱里的一只冻鸡，北岛总想把它拿出来化冻，让它复活，让它生蛋孵出小鸡来。心诚则石开，北岛的诚心最终说服了我。

促成我做出决定参与《今天》复刊的当然也有那时的政治背景因素。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事变，好像宇宙间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它改变了很多星球的运行轨道。至少，它也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方向。那时我和很多海外的留学生一样投入过抗议天安门屠杀的活动，还因为年长一些而被人看作幕后黑手。那时国内的气氛也非常恐怖，大学生被送去军训，支持学生的老师被下放劳动，连我母校的导师都劝我不要急于回国，流亡感就变得真切起来。而那么多国内作家突然流亡到海外，其中不乏我的《今天》老友如北岛、杨炼、顾城及多多等，此外还加上了高行健、刘宾雁、刘再复、李陀、孔捷生、苏晓康、郑义等本来属于体制内的作家。那时，我感觉中国文学在国内将再次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的状态，而海外流亡作家迫切需要一个发表作品的基地。

但我很清楚，《今天》复刊需要的不仅是我这个能做点事情的编辑，更需要钱，也需要稿件。北岛离开奥斯陆的那天，我和杜博妮去机场送他，在候机楼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下一个学期当代中国电影讲座的人选。这个讲座本来的计划是邀

请陈凯歌来讲的，但是陈凯歌已经推辞了。杜博妮就希望我来讲，因为我毕竟参与过电影《黄土地》的争论，有文章发表过，而且我还根据阿城小说《孩子王》改编过电影，是陈凯歌导演的，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来讲讲电影，花掉这笔钱。

这时我想起了北岛的“冻鸡”，就对杜博妮说，电影就不用讲了吧，如果你同意把这笔钱给我，那我就拿来重新出版《今天》，作为启动的第一笔经费。我们用这笔钱来邀请一批作家到奥斯陆开会，我们出机票，而每个人都要带一个新作来，那么第一期的稿件都有着落了。杜博妮看看我，点头同意了。北岛也笑了，说是迈平总有好点子，那个时候他可能忘记了我的“失语症”。

送走北岛，我就开始筹备复刊号，就联系要请来开会的作家。这就是1990年春第一次编委会是在奥斯陆而不是别的地方召开的由来。可以说，没有杜博妮当时点头同意支持，那么复刊就没有经济条件，还可能遥遥无期。

就是这样，一批海外流亡的中文作家在那年五月聚集到了奥斯陆。高行健带来了他的最新剧作，就是发表于复刊号的《逃亡》，刘索拉带来了小说《人堆人》，查建英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小说《节目》，还带来了史铁生的小说《第一人称》。诗歌的阵容比较强大，有多多领衔，北岛殿后，中间是杨炼顾城等老《今天》的元老诗人，也有后进诗人张枣和李笠的作品补空。散文部分除了多多和杨炼，还有了钟鸣的两篇作品。而评论部分有了后来在《今天》也发挥重要作用、编辑《今天》英文双年版的赵毅衡，以及李欧梵、李陀、刘再复和黄子平评论老《今天》意义的四人谈。当然并非所有投稿者都到了奥斯陆开会，我们的钱也没那么多，此外顾城、黄子平和刘再复都因为当时手里没有有效护照而不能成行，只能放弃。到奥斯陆的除上面提到的作家，还有孔捷生、老木和徐星，虽然他们没有带来作品。

为了节约经费，这次开会是在奥斯陆北郊的克林肖学生城租了一套学生公寓解决客人住宿，还请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厨房里给大家做饭。开会也是利用了学生城的活动室，一切从简，连话筒都没有准备。这次编委会议的纪要后来由奥斯陆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于小星帮助整理发表在《今天》1990年第2期上，内容包括汉语流亡作家的生存环境、《今天》的基本定位和编辑方针等等。

**（此处可附加奥斯陆开会时的照片一两张，《今天》三十周年纪念集里有）**

北岛离开奥斯陆之后是流亡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来了。当时瑞典笔会授予他图霍尔斯基奖。图霍尔斯基原来是德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批评家，因反对德国纳粹势力抬头而被迫流亡瑞典，但在流亡中备感压抑而自杀。瑞典笔会在瑞典文化部支持下于1985年设立此奖，为的不仅是纪念图霍尔斯基，更是为了帮助流亡作家，避免他们落入图霍尔斯基那样的境地。这笔奖金可供一个流亡作家在斯德哥尔摩居住和写作半年。

北岛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这段时间里，认识了另一位后来对《今天》在海外的发 展也有很大贡献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当时罗多弼正好接替他的老师、荣休教授马悦然的职位，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别是前清思想家戴震。他对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马悦然那么熟悉，基本上也不从事中文文学的翻译工作。但新官上任，总想有番新的作为，做出新的成绩，他听北岛说起了《今天》复刊以及我们在奥斯陆筹备这个作家会议等等就非常感兴趣，愿意邀请参加奥斯陆会议的全班人马到斯德哥尔摩来继续开几天会，由中文系负责我们从奥斯陆到斯德哥尔摩的往返车票和住宿费。

所以，奥斯陆会议结束之后，全班人马又坐火车来到瑞典首都。我还记得我们入住的是市中心的步行街皇后街的皇后旅店，听起来很气派，其实只是个古旧的住宅改建的旅店，多数客房里连卫生间都没有，要到走廊里的公用卫生间洗浴。但这里也古色古香，墙上四处挂着古典色泽的油画，客厅餐厅的家具都是仿制十八世纪法国流行的风格，连沙发都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气味。

第一次编委会议需要讨论的事情其实在奥斯陆开会时都讨论过了，所以在斯德哥尔摩大家比较轻松，其实没有再开自己的什么会议，而会外的活动反而更多一些。皇家剧院为我们这些来访的中国作家举办了一个“中国之夜”，朗诵一些作品；瑞典文学杂志《九十年代》也邀请我们参加了他们主办的一个文学晚会，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刘索拉因为挂念国内旧友而激动伤感，我们只好都提前退场送她回酒店。但索拉在晚会上唱的蓝调已经给《九十年代》的主编留下很深印象，后来还再次邀请过索拉来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

最有意思的会外活动大概是我们和一批瑞典作家的长桌对谈，面对面地交流。坐在桌子那边的瑞典作家中，就有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学院院士的女诗人弗洛斯腾松和文学史家恩格道尔，两人还都进入了由五院士组成的诺贝尔评委会，恩格道尔还担任了十多年常务秘书。当时谁会想到，坐在长桌这边的中国流亡作家中的高行健，后来就是由他们评选出来的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此外，长桌那边还有一位瑞典著名的左派文学评论家格莱德做了评价北岛诗歌的发言，这篇题目为“什么样的自行车”的论文后来由我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今天》复刊号上。

瑞典笔会也参与了接待我们的工作，笔会的国际秘书玛丽亚·艾克曼一直跟随我们的活动。根据于小星整理的会议纪要记载，国际笔会得知我们这些流亡作家开会的消息之后，“曾传来口信称，如果这次会议能成立一个海外中国作家笔会中心，将予以考虑接纳为正式会员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意见分歧比较大。”来北欧开会的这些作家，大多强调独立写作，个人性很强，不愿意参加组织性的活动，只有老木是最积极的，因此这个动议被多数人否决了。十多年以后，我和另外一批海外流亡作家刘宾雁、郑义、贝岭和孟浪等人成立了独立中文笔会，2001年被国际笔会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接纳为会员组织。我自己后来也参加了瑞典笔会，还接任过玛丽亚当年担任的瑞典笔会国际秘书的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斯德哥尔摩的会议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国外的汉学家来参加。比如英国的汉学家利大英当时特地赶来旁听，还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对会议上很多作家做了专门采访。当时他就和我谈起过编辑出版《今天》英文版的设想。这个会议的经过，后来他写进了一本叫做《中国失去的年代》的英文著作中。

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认识了温文儒雅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没想到，就因为他的关系，我后来会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来教书，还会在这里成家落户，而《今天》编辑部也随我搬到了斯德哥尔摩。我为《今天》做事本身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工资可拿，那么生计问题就需要自己解决。正好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老师、马悦然夫人陈宁祖因患癌症病休一年，在北岛的张罗下，罗多弼就聘请我来这里代课，一年后宁祖身体稍有恢复回来上课了，罗多弼还安排我留下来继续工作。他给我的办公室特地配备了可以直拨国际长途的电话，允许我使用中文系的传真机接受发送稿件，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今天》杂志通讯联络上的大问题。所以，《今

天》的生存发展，罗多弼也是功不可没的。《今天》杂志上的鸣谢名单上一直都有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就是这个原因。

## 芝加哥 — 爱荷华

第二次编委会议是在 1991 年七月。

那年夏天，查建英和她的丈夫在北美芝加哥操办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学术项目，历时两个多月，内容是探讨 89 年的事变之后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这个项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参加者除了当时在芝加哥的学者如李欧梵、刘再复、李陀、黄子平和甘阳等人，还从大陆、港台和海外陆续邀请了一批办文化杂志的人，记得有北岛和我（《今天》杂志），朱伟（后来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爱乐》）和吴斌（《读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以及林道群（《二十一世纪》）以及来自台湾的金恒伟（《当代》）等等。

聚集芝加哥的这批人，很多也都是因为《今天》我才认识。查建英和黄子平原来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在北京时就和我们《今天》杂志的同仁有过私下的来往，子平还在老《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李欧梵当时出任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主任的职务，我和他其实也是八十年代初就因为《今天》在北京见过面。那时他是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也想悄悄联络《今天》的诗人和作家，后来通过我的大学同学潘援（父亲是香港《大公报》老报人）找到我，又通过我找到了北岛。潘援后来也在李欧梵帮助下去美国留学，曾发表过全面介绍《今天》的英文文章，登在《毛之后：中国文学与社会》这本书中，是第一篇在西方全面介绍《今天》的论文。

为了省钱，芝加哥会议的参加者都不住旅店，而是散居朋友家。朱伟和我是合租了一套房子，自己做饭。房间里没有空调冷气，而芝加哥的夏天有时热得像蒸笼，我们赤着膊还是大汗淋漓，真像是蒸笼里的馒头。朱伟也是上海人，精通美食，烹调讲究，后来还写过一本谈吃的书。我做饭的时候他也常站在旁边指导。他和我早在北京就认识，而《今天》也是我们建立友谊的渊源，他担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时候，就把我在《今天》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短篇也拿去转载了。

聚集在芝加哥的这批人有一个共识，即中国民主的实现不仅在于政治改革，更需要扎实的文化建设。民主需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社会之上，而公民社会发展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具有大量的文化空间。一本杂志其实就是一个这样文化空间，能办好一本杂志本身就是对民主事业的最大贡献，所以在芝加哥开会的人，后来分头回去都是办杂志，而且这些杂志全都能坚持到了今天，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当时有人把聚集在芝加哥这批注重文化建设的人和同时聚集美国东部普林斯顿大学的偏重政治改革的中国流亡人士（“中国学社”）做过比较，分析各自思想倾向和道路的不同，称为“芝加哥派”和“普林斯顿派”，其后发展结果也自然不同，这是研究当代中国历史者不能忽视的一个阶段。

不管什么派，聚集在芝加哥的这批人里面有不少同时是《今天》编委，包括查建英、黄子平、阿城、李欧梵、刘再复、李陀、刘小枫等等，名字都曾出现在《今天》海外复刊号上的编委会名单里。利用这个难得的聚集时机开个我们自己的会，再讨论一下《今天》的编辑方针和今后发展方向，自然是情理中事。所以，七月里



的一天，大家利用去爱荷华到当地作家聂华苓家做客的机会，借她的宝地开了一个小会。聂华苓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她和丈夫、美国诗人安格尔长期经营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都会邀请几十位各国作家来爱荷华住几个月，一边写作一边交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每年也会邀请几位中国大陆作家到爱荷华来，先后接待的作家中就包括北岛、阿城等人。她的家几乎就是一个中国文学沙龙。

在聂华苓家开会的，除去上面提到的几个编委，自然还有北岛和我。林道群后来也到了芝加哥，但没有赶上爱荷华的编委会议。无论如何，正是在爱荷华这个非全体编委会议上，做出了扩大《今天》视野的决定，要把《今天》的内容从纯文学扩大到更广义的文化，把电影、美术、戏剧等都包括进来，而且提出了每期都争取编一个专辑的设想。会议之后的头一个专辑就是请阿城策划的华语电影专辑，即《今天》1992年2月号上的那个专辑，而查建英则筹备了下一期小说专辑（那期写编者按的扎西多即查建英）。于是，除了严力、多多、刘索拉和徐星之外，韩东、朱文等一批南京小说家，也从查建英的这期专辑开始在《今天》粉墨登场。

爱荷华会议之后，阿城在电影专辑的编者按中曾这样写道：“……（回）去芝加哥的路上，大家在密西西比河边停留，密西西比河水量充沛样子却温和，有地久天长的气度，任何期刊的稿源若同此河，即可养尊处优……”阿城最后感叹《今天》缺少稿源，“无尊可养亦无优可处”。其实这将是《今天》永远的状态，当年如此，现在还如此，永远是艰难的状态。

对我来说，这次芝加哥——爱荷华的编委会，比较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林道群，清瘦而精干，待人诚恳，让人一眼就放心，我们后来合作了很多年，友谊延续至今。道群是位资深老编辑，当过香港三联书店、《明报月刊》和《二十一世纪》的编辑，自己还办过社会思想出版社，后来才出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职务。据道群回忆，他是带着刚印好的《今天》海外第二期到芝加哥的，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取杂志的时候，还失手把杂志撒了一地，那个可笑的场面让他记忆深刻。这个细节可以说明，《今天》的印刷出版迁移到香港是很早的事情，早在《今天》海外复刊第二期道群就开始参与了。

在爱荷华，我第一次会见的另一个《今天》重要人物是任教爱荷华大学的台湾诗人吕嘉行的夫人谭嘉。谭嘉热心、负责而能干，有大姐风度，是北岛发掘出来的管理人才，那时已经接管我们《今天》的财务管理工作，后来还接替我担任过《今天》的社长。《今天》百期中比较艰难的一大段路，是谭嘉大姐和我们一起走过来的。

在芝加哥的这段日子里，我还多次见到了以广西花山岩画风格而闻名的画家周氏兄弟。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芝加哥买下了一座废弃的电影院作为工作室，也时常在这里招待八方来客各路英雄豪杰，疏财仗义的气派让我想到《水浒》中的人物，对《今天》自然也有过慷慨的资助。后来有好几次编辑会议都得到过周氏兄弟的赞助。

海德堡 — 布拉格

《今天》复刊之后的再下一次编委会，应该是在1992年12月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举行的。那时编委徐星还在德国四处流浪，也想做点事情，就动员海德堡大学东亚系主任、汉学家瓦格纳和我们《今天》合作筹办一个有关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讨会，还申请了德国亨利希·伯尔基金会的资助（伯尔即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代表《今天》申请钱的那份英文报告还是我起草签字的，但是那次会议我自己没有去参加，当时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课比较多，一时走不开。

借助海德堡那个研讨会的聚会之机，《今天》也在当地开过一个自己的编委会。

《今天》复刊初期的多次编委或编辑会议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举行的，寄生在某个学术会议名下开，自己就不用花什么钱。如果就用《今天》自己开会的名义也难以申请到钱，我们也不会把有限的资源花在开会。海德堡那次会议的情况，徐星后来在《今天》1993年第一期上介绍过，但编委自己开会的情况他没有提。这可能是因为徐星自己对《今天》上登那么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章有不同意见，他希望的是办一个先锋性的纯文学的杂志。所以那次会议之后即1992年年底那天他就写了信给我宣布退出编委，此信就发表在1993年有海德堡会议纪要的那期《今天》上。从徐星的介绍来看，参加那次会议的编委除了北岛外，还有多多、顾城、高行健等。

重读徐星的会议介绍，我才知道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的师妹张辛欣也参加了海德堡那次中国文学在国外研讨会。张辛欣是八十年代在中国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和北岛也早就认识，可以算是《今天》的老朋友。记得北岛曾经告诉我，还是北京的老《今天》的时代，我们自己油印缺纸，张辛欣那时就为我们“顺”来过纸（“顺”为“顺手牵羊”之“顺”）。在会议上发言的另一些重要人物，还有当时在海德堡任教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以及平路等等。这说明《今天》的中文文学视野，早超越了中国大陆而覆盖了整个汉语世界。

我自己参加的下一编辑会议，是1993年夏天在布拉格。

奥匈帝国三个著名的音乐都城，即布拉格、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可谓古典音乐的三大明珠。我在1989年八月就去过一次布拉格，非常喜欢匍匐在伏尔塔瓦河上的这个金色的城市。不过，那次去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还在铁幕之内，气氛有点压抑甚至恐怖。那个夏天，北岛还困居在东德包围之中的西柏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有些孤单，我开车从北欧过去接他，准备一起去捷克和奥地利等地散心。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刚过，听说有些东欧国家会把流亡的中国人士遣送回国，东德已经有了先例，所以北岛那次都不敢跟我坐车经过东德，是坐飞机到西德这边的纽伦堡，我开车到那里和他会合之后再进捷克。捷克边境荷枪实弹的边防人员也是面容严肃仔细盘问，连车底都要严格检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来自西方的游客把书籍杂志带进去，造成“精神污染”。

布拉格的著名高等学府查尔斯大学的汉学家奥尔加是北岛诗歌的捷克文译者，也是《今天》的老朋友。这个奥尔加，当然不是哈维尔致狱中家书的那个奥尔加。我们到布拉格就是在她家投宿，但那天她正好不在，带着孩子到乡下老家去了，是她的丈夫尤拉接待我们。当时我们算是来自“西方”的游客，手持外币西德马克，富有程度就如文化大革命中到中国的老外。我们就请尤拉在当时布拉格唯一的一家豪华中餐馆四川饭店吃了一顿美餐，因为点得太多吃不完，走时还剩下不少，让尤拉不断摇头叹息，后来在奥尔加那里还告了我们一状，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太铺张浪

费了。数年后我们又去布拉格，尤拉还念念不忘地提起这件事。中国人吃饭的浪费恐怕不仅仅是今天的故事。

奥尔加安排我们和布拉格的地下文学刊物《手枪》的人马见面，其中有个编辑马丁也会说中文，还是哈维尔的朋友。两个共产专制国家的地下文学刊物就这样在布拉格的地下会师了。当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捷克的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都特别轻松、乐观而开朗，虽然还在铁幕之下，给人的感觉却是自由对于他们好象就是囊中之物随手可取，就如伏尔塔瓦河的流水不可阻挡，而事实也是如此，捷克知识分子领军的天鹅绒革命那时已经指日可待。相比之下，89年夏天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先是狂热然后是沮丧，而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苏联变革中几乎也没有任何领军作用。

北岛为这次布拉格之行留下过一首诗，也是他的诗作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中文本就发表在《今天》复刊号上，而英文版就登在杜博妮和我翻译的《旧雪》中。在此摘录其中几段：

一群乡下蚊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幽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买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成功之后，《手枪》杂志也从地下冒上了地面，马丁还担任了捷克政府文化部里的什么职务，杂志也有了一些经费，甚至有了一个办公室。奥尔加那时已经成了查尔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1993年，他们联手邀请我们《今天》同仁重访布拉格。他们的钱大概还是不多，所以邀请的人大都限于欧洲范围，欧洲之外的客人只邀请了李欧梵。邀请李欧梵是因为他和捷克汉学渊源很深，我记得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著名捷克汉学家普契克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为课题。

借着几个编委又凑集在布拉格的这次的机会，我们开了一次编委会议。除了北岛和我，还有赵毅衡、张枣和宋琳等。张枣当时还在德国攻读博士，也是很早就进入了《今天》编辑部，负责编辑诗歌。宋琳当时还住在法国巴黎。住在巴黎的小说

编辑张亮是否参加我真的记不得了，也不记得杨炼或顾城为什么没有参加，虽然他们那时也在欧洲。我和这几位编辑在工作中的通信联络已经很多，但聚会见面还是第一次。

这一次去布拉格我不是开车，而是坐捷克航空公司的飞机去的。飞机降落布拉格机场的同一瞬间，机舱里就开始播放斯美塔那交响诗《伏尔塔瓦河》第二乐章“我的祖国”了。脚还没有踏上捷克的土地，你就已经感觉到那种自由畅快。

布拉格会议的内容我记不太清了。由赵毅衡开始编选英文的《今天》双年版大概就是那次会议决定的。赵毅衡年长，既有学者又有兄长风度，我们都称他为老赵。没想到他还是我上海复兴中学的前后校友，只是比我大了几乎一轮。老赵当年本来是学外语出身，在国内文学圈子里就小有名气，因为他翻译过两本美国诗选，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文化革命以后他成为现代著名诗人、莎士比亚专家卞之琳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到美国加州攻读比较文学拿了博士学位，是个既通文学理论又有写作实践，既能写深奥的学术论文又能写小说和诗歌，既通英文又精中文，是个非常少见的才子。《今天》复刊号上就发表了他论“元意识”小说的评论，让我又有启蒙之感。就编选《今天》英文版来说，老赵的做法也比较民主，哪些作品可以入选都是他先复印了各期目录让大家分别勾选，最后他统计出勾选最多的作品，才能入选。在《今天》的历史上，老赵也是让我难忘的人物。

布拉格会议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件事情，是会议开完之后北岛和老赵等先走，而我和张枣、宋琳都是下午的飞机，就留在旅馆继续闲聊。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老《今天》之后的所谓新生代诗人，能听到他们发出的心声，而他们又是北岛请来担任诗歌编辑的，这本身就是《今天》诗歌代谢生长的明证。

那次在布拉格期间还有件难忘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晚上奥尔加请我们去听了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堂·乔万尼》），演出就是在1787年这部著名歌剧首演的那个歌剧院。剧院还保持着十八世纪的样子，可以把你带回到欧洲古典音乐最辉煌的那个年代。坐在那样的古老剧院里你就不得不相信，优秀的文学和艺术超越时代，也超越政治，是任何文化大革命都不可能摧毁掉的。

最近我给奥尔加去信，请她帮助我回忆布拉格会议的情况。她回信说，“很多细节我也记不清了，只有一些闪回的场景——比如说在老城一个地下酒吧的讨论。在谈到如果我们漂流到一个荒岛的话会随身带什么书的时候，张枣说他要带一本《唐诗三百首》，让我非常吃惊。我也隐约记得，马丁带我们去听了一个过去的地下乐队的音乐会，但是因为太嘈杂吵闹，我只待了几分钟就离开了。北岛好像也不喜欢那里的吵闹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手枪》杂志办公室的第一次会谈，那是在接近火车站的老城，窗户朝南阳光明媚。参加的捷克人中还有伊凡·马丁·伊鲁，曾是著名的地下诗人，也曾经坐过很多年的牢。伊鲁非常愿意和北岛谈话，因为他热爱二十世纪初马修斯翻译成捷克文的中国古典诗歌，甚至可以背诵李白诗歌的捷克文译作。他对北岛说，北岛是中国这种伟大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北岛却不同意，北岛强调自己是‘现代诗人’，和唐代那些大师不同，那些大师已经属于过去。我觉得他们的谈话非常有意思，也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当时做翻译），甚至还用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为最近的一次演讲的开头。……”

我回信给奥尔加说，我相信二十多年过去，北岛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看法，现在肯定和当年不一样了。

## 纽约 — 法拉盛

纽约我去过太多次了。

我是在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中国殖民城市上海长大的，所以对另一个殖民城市纽约并无陌生感，甚至可以说一见如故。特别是那些唐人街，铺面风格招牌广告都和上海无异，走在那里就恍若回到了故乡上海，还可以吃到道地的上海风味早餐大饼油条豆腐浆。此外，我后来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专业是欧美戏剧，硕士论文也是写美国戏剧家，对于百老汇自然也应该相当熟悉。

这个城市住着很多我的友人，可以讲述出很多友人的故事，我自己在这里也留下了太多的五味杂陈的记忆。而很多次纽约之行，也都和《今天》有关。我第一次去纽约是1990年冬天，那次就是背着刚出版的复刊号《今天》去和北岛做推销，努力敲开一些书店的大门，而感到寒冷的不是曼哈顿的风而是人们的冷面。我们住得倒不错，是在紧靠第五大道与之平行的花园大道上的瑞典外交公寓里，而公寓主人是瑞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魏安妮，也算是我们《今天》的老朋友。魏安妮也是马悦然的学生，会说很好的汉语，八十年代初在北京担任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那时我在杜博妮的北京住宅里就认识了她。前面已经说了，没有《今天》我就不会认识杜博妮，而没有杜博妮我也不会认识魏安妮。1986年我出国留学去奥斯陆，那时没钱坐飞机，是坐西伯利亚火车到莫斯科再转车经过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去的，经过斯德哥尔摩时我就在魏安妮家里住了三天。

我第二次去纽约是1991年芝加哥——爱荷华那次会议之后。那时我刚认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安娜，她也到美国来和我相聚，那算是我们的“蜜月旅行”。我们住在法拉盛的一套不错的公寓里，而招待我们的主人就是老《今天》的哥们诗人严力。没有《今天》我自然也不会认识严力。严力也是星星画会的艺术家，他的公寓里那时挂满了他用胶木唱片制作的系列作品，我至今还收藏着他当时送给我的用一个胶木唱片制作的空钱袋。这也成为一个象征，好象我生活里总是有个空钱袋。那时严力也已经创办了一个全球性的中文诗歌杂志《一行》，已经出版了十来期，几乎囊括了海内外各地“非官方”汉语诗人的作品，可以说他也是桃李遍天下了。所以，《今天》其实不算海外最早出现的中文流亡文学刊物，晚于《一行》。

再后来我为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做过一点欧洲方面的联络工作，也来纽约参加过几次理事会议，虽然我从来不是理事。我愿意为这个组织做点事的主要原因其实也和《今天》有关，因为这个组织当时的主席刘青就是老《今天》工作人员刘念春的兄长。他们在北京的家当初就是老《今天》的编辑部。刘念春对《今天》是有贡献的，而且后来因为参加一些劳工方面的活动而被判刑，当时还在国内坐牢，那么他的兄长要我为“中国人权”做点事情，我是无法拒绝的。这不仅是人权的理想更是普通人的情义。

刘青还有一个身份是当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民主墙运动时期出现的各种民间刊物和团体的联席会议主席，而那些民刊中就包括《今天》。那时的政治环境其

实还相当险恶，民间刊物和团体需要结成同盟共患难同命运，这样可以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后来中国美术馆外的星星美展被查封，作品被没收，各民间刊物和团体上街抗议声援，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一国庆日长安街大游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同盟协议。北岛当时就是走在抗议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带头人。刘青本人是属于《四五论坛》的，但后来被判重刑坐牢，却是因为声援办《探索》杂志的魏京生，秘密地将魏京生受审时的法庭辩护词录音，又整理油印出来在民主墙散发。起诉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和煽动颠覆政权。

也正是因为《今天》和西单民主墙时期其他民间刊物有这样的同甘共苦的关系，我见到民主墙时代的老朋友总是感到非常亲切，视为兄弟。在纽约，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除刘青外，还有编《沃土》的胡平，以及同时期在广州办民间刊物的刘国凯等，我到纽约时都曾经在那些朋友家留宿。我自己也在斯德哥尔摩接待过这些朋友。2009年，我还来纽约参加过纪念西单民主墙三十周年的会议，见到了徐文立、王军涛和任晓町等民主墙时期的朋友。顺便说起，奥尔加那年在布拉格也举办过类似的会议，因此我曾经三访布拉格，见到了魏京生等西单民主墙的老朋友。

老《今天》的这种历史背景现在的年轻读者大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上面多写了几句。

1994年《今天》在纽约法拉盛唐人街举行了一次编委会议，同时举办了对外界的研讨会等等，声势比前几次会议都浩大，还请来了一些名人，比如那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而如今已经主掌哈佛大学中文系的王德威。来助威的还有美国的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和黎安友等人。纽约的华文报纸也做了采访和报道。这也是《今天》第一次自己出钱独立主办会议，完全不挂靠在任何大学的学术会议名下。会场也比较正式，客人都入住法拉盛一家华人开的星级宾馆。

这次会议大概是《今天》的人马聚集得最多的一次，欧洲的编辑几乎也都来了。我也在这里头一次见到了过去只是通信联系的编辑同仁，比如编辑散文的王渝，也是从台湾来美定居的作家，一位大姐风度的人物。此外是当时加盟《今天》负责编辑文论的女将孟悦，后来我曾请她到瑞典开会。还有编委张郎郎，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现的地下诗歌运动“太阳纵队”的传奇人物，可以算是《今天》的先驱，我也编发过他的回忆文章，一见如故。客人里还有《今天》创建初期的一个人物，是北岛的老熟人，名字我记不清了，后来定居美国波士顿，特地赶到纽约来捧场。不过，他是当年反对《今天》和民主墙其他刊物结盟而退出的人之一。另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是会相面看风水的大师艾端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前面提到的深谙姓名学的大师其实就是他。他的太太曾慧燕则是报道我们这次会议的纽约《世界日报》记者。白天的会议之后，晚上我们聚集到曼哈顿一所大楼里的富户人家开派对，主人好像取了个猫的名字叫咪咪。在那里我还见到了郑义及其夫人北明，都是传奇人物，他们离开大陆的过程就是个惊险传奇的故事，北明不仅是文笔很美的才女作家，又能谈琴能唱歌，显然是晚会的明星，给人印象深刻。

这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今天》编委会议。北岛后来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今天》的工作重心也就随他逐渐移向了美国西岸。他在当地物色到一位能干的编辑、研究美术史的留美学者王瑞芸，基本上能接替我斯德哥尔摩这边的《今天》编辑部的工作。这是一位我至今还没有见过的《今天》同仁，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编辑工作而通信联络比较频繁一些，从她的文字中我总能感觉到女性的细致和

敏锐，文字把关相当不错。我记得《今天》后来在加州王瑞芸住的城市开过编委会，而我要从瑞典过去也不容易而且会花费《今天》不少钱，就没有参加。想象大家聚会的情景应该是很热闹的，《今天》总是不断加入新生力量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我感觉自己好象已经落伍，再也做不了什么了，不久我就给北岛写了辞职信。

\* \* \*

《今天》海外复刊早期的路途，就是我爱到的这些城市串联起来的，就如一列火车要在途中停靠的站点。而此文停笔之时，我也很快要启程去香港，到北岛那里参加一个介绍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工作坊。我想，其实香港才是应该我大书一笔的城市，是这个漫长路途最重要的终点，因为北岛也到了香港，因为林道群一直在香港主持出版发行，因为《今天》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在香港举行的。我本来也会应邀参加那次聚会，可以见到很多《今天》老友，以及很多从未谋面的《今天》新人，那样我就会有些感受可写了，可因为家里突然有事而未能成行，这是一件让我非常遗憾的事情。

其实我希望香港也不是《今天》的终点，《今天》的终点永远在未来之处。

2013. 3. 25，于斯德哥尔摩

## 同人于野

——《今天》杂忆

宋琳

1992年春天的某个午后，我在巴黎家中接到一个电话：“是宋琳吗？”声音是陌生的，音调偏低，但带点甜美。“是我。你是哪位？”对方答道：“我是张枣。”那时我刚到巴黎几个月，知道张枣在德国特里尔读博士，从北岛给我的几期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到他的近作和翻译，但我们还从未见过面。我很兴奋！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便谈到诗。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要乘地铁快线去Port-Royal站附近的妇幼医院照看出生后还未离开育婴箱的儿子，口袋里揣着的地铁读物中就有《今天》。春季号上张枣的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读起来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我告诉了他我的印象。

过几天北岛打电话来，请我参与《今天》的编务，说他同时也邀请了张枣，由我们两人负责诗歌栏目，一人编一期，轮换进行。我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听张枣说，是北岛让他事先“刺探”一下我，看我俩是否气息相通，能不能共事。六月初，我去英国参加伦敦大学举办的当代汉诗研讨会，住在胡冬家里，第二天我们俩一块去机场接张枣，他的形体比我想象中的稍胖（之前我在一本诗选里见过他的素描肖像），但他目光炯炯，英气逼人，我毫不费力地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几日我们三个几乎天天泡在一起，参加朗诵会，观摩大英博物馆，去西敏寺教堂的诗人角寻找伟大英国诗人的名字，坐在公园僻静处的草地上长谈。“话语的织布机”（张枣语）似乎没完没了，不会自动停下来。胡冬个头高大，留着长发，一张白皙的、孩子气的脸。1986年夏天，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北岛时，他曾委托我将一笔稿费转给胡冬，顾彬将他的一首诗译成德语发表在一家德国的刊物上。当时胡冬在天津，我和他并未谋面。给他去信不久，收到回信，随信还寄来一组手写的《九行诗》，可惜我几经动荡给弄丢了。北岛因《中国》杂志的事宜与牛汉一道来上海找老诗人辛笛，住在静安区一个招待所里，我和王小龙去看他们。北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既沉着又轩然，眉宇间有狷者之气，也符合我对革命党人的想象。1988年夏天，朱大可约我参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鉴赏辞典》的编撰，我们住在厦门大学的宾馆里分头写，我写的一组赏析文章里有张枣的《惜别莫妮卡》。那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据说连书稿也找不到了。张枣和胡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我不知道，但我在与他们见面之前通过诗歌可以说神交已久，我们三人的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共同的流亡背景使我们成为朋友几乎是必然的。可能因我们在草地上坐得太久，一个女警察注意到了我们，好奇地过来询问，胡冬趁机跟她开玩笑，说他正在说服两个编辑发表他的诗，不大好办，所以还得费点口舌。女警察对诗似乎不太感兴趣，况且我们的神态在她职业性的审视下，估计也与偷渡客或吸毒者应该有的样子不相符，便笑着走开了。

我记得张枣首次编《今天》是1992年第二期，我则从第三期开始。复刊后的《今天》是一本流亡者的文学刊物，那么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八九前后流亡到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这种现象在现代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990年宣布《今



天》复刊的奥斯陆会议的参加者有十多人。北岛是《今天》的创始人，现在依旧是《今天》的关键人物，因为办一本流亡刊物需要当年办地下刊物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众多天涯羁客得以在这个新的文学驿站云集。写作终究是个人的事，而一本适时出现的方向明确的刊物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将提供见证，一个杂志或一个社团，可以催生文学运动，记录一代人的心灵历程。从这个角度说，《今天》是具有同人性的，尽管它漂泊在海外，对于国内一度沉寂的先锋阵营而言是一个温暖的信号，一种精神支援。没有《今天》的记录，多少有价值的文献将湮没无闻。我是1991年才出国的，对当时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今天》复刊时我还在狱中，出来后听说又一批诗人入狱了。我在入狱前一周写的短文《下狱书》不知怎么流传到了北岛那里，并在《今天》发表出来，我自己直至见到刊物时才知道。我记得是南方给了我那一期，而他很可能也是从某个来上海读书的外国留学生手里得到的，他约我在一家咖啡馆里秘密接头，悄悄地把一卷东西塞给我。南方后来也来到法国，住在巴黎，成为《今天》的小说编辑，并且是年份最长的编辑之一。南方性格尖酸古怪，不易与人相处，但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经由他的推介，一些自觉处于边缘地带的作家如康赫、范剑平、黄石、丁丽英、王艾、宋述、薛荣等得以在《今天》这个平台施展才华。北岛曾认为“小说一直是《今天》的弱项”（见1992年第一期编后语），南方加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他功不可没。现在回头观想，《今天》能够幸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尽管编辑部数度搬迁，编辑人员几经更换，最要命的是，四处化缘而来的出版经费几近枯竭，居然每次都柳暗花明，渡过劫波，一直来到今天。《今天》同人，尤其是主编北岛，终于可以像别人描述毕晓普那样，面对一百期杂志而不无欣慰地“躲在文字背后，……从一数到一百”了。然而重读一遍万之在1992年第二期上的编后语，我不禁发出几声唏嘘：

复刊之时，曾有人预言《今天》活不长久。纽约有一位深谙姓名学的大师给《今天》算过一命，说《今天》二字均为四划，“四”与“死”谐音，所以《今天》必死两回无疑。八十年代在国内已经死了一回，这回在海外还要再死一回。大师又说，《今天》人事不旺，“今”字只存一人，“天”字只存二人，一二人办杂志，不成气候。

我不知道那位大师何许人也，但他的测字之术还真是相当了得，几乎被他一语成谶。若把《今天》比作一个人，或可套用一句古语：不罹九死，几负一生。不过说《今天》人事不旺则未必准。据我所知，阿城、杨炼、李笠、王家新（即子岸）都曾短期参与编《今天》，从九十年代初始，先后在《今天》共事的还有谭嘉、李陀、王渝、黄子平、刘禾、孟悦、林道群、顾晓阳、赵毅衡（负责《今天》作品英文双年选）、王瑞芸等人，2008年后又有欧阳江河、徐晓、翟永明、朱朱、韩东、林歆菊、廖伟棠、肖海生、李云雷、鲍昆先后加入，如果算上通讯编辑、网络编辑、社长助理、经理、发行人，《今天》俨然是鸟枪换炮了。

网络时代办刊的难度大大减少了，网络普及之前像《今天》这种少见的流动刊物，每期要按时出刊并非易事。每个人都是业余的，所谓编辑部只是个影子，并不存在一间办公室。不同时期的《今天》同人大都成了朋友，但有的我只见过一、两面，有的至今都无缘相遇。起初，稿件和书信往返都得通过邮局，极为不便，遇到

搬家或出行，邮件被耽误甚至丢失是常有的事。有时，某个作者把同一份稿件同时寄给了张枣和我，因未能及时沟通，发生过一两次重发的事故，很令人痛心，对于一个严肃的杂志来说是极不应该的。刊物主要通过海运寄送，一般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加上稿件邮寄、统稿、排版的周期，等发现错误，很可能下一期已经下厂印刷了。那时我们都很穷，为了节约，我尽量不寄特快专递，而是寄普通的航空信，这样就比较慢。北岛的时间观念强，总是经常叮嘱，发出种种指令：“为了打开北美地区的发行网，使刊物及时抵达，出版时间应提前半个月”；“最后截稿期（以纽约时间为准）将随之提前”；“百分之六十的稿件应在截稿期前一个月发出”，于是每当那个日子临近，我都会感到神经紧张。据林道群（他是最后发稿人）回忆，为了减少邮件的重量，张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将稿件剪成细长条装进信封里，反正诗歌是可以瘦身的。不记得从何时开始，编辑部给每个编辑都配备了传真机，这样一来，联络沟通方便多了。

92年度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是“中国年”，应邀的中国诗人比较多，多多、芒克、顾城、翟永明、王家新、洛夫等都参加了。为了在《今天》上反映诗歌节动态，北岛特意请来张枣。6月19日，《今天》编辑部召开座谈会，与南非诗人布莱登巴赫（Brenyten Breytenbach）、美国诗人詹姆斯·麦里勒（James Merrill）、英国诗人西蒙·阿米达治（Simon Armitage）进行了一次对话，中国诗人方面有北岛、多多、张枣、童蔚和我，由多多主持。也许目标是更多了解当前国际诗歌写作的现状，北岛事先请我们准备了几十个问题。例如口语化、日常性、读者反映、来自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及经典之压力下的写作、神性的影响、翻译、暗喻在诗歌中的地位等等。阿米达治介绍了英格兰诗歌追回读者的新运动，以口语化对治学术化。诗歌节期间他就身体力行，坐在宣传车里沿街朗诵、散发诗歌传单。经历过八九，我们对此类诗歌行动多少有几分羡慕。谈到暗喻，他举了“坦克停在它的声音上”那个例子，我觉得颇为贴切，但在某种特殊语境中，例如我自己在1990年写的一首诗里，就不得不用“黑黧的车轮”替代“履带”。这肯定不仅关涉语言问题，时至今日，我以为依旧值得这样去追问：是否“暗喻只暗喻了暗喻的不存在？”布莱登巴赫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和小说家，因触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坐过七年牢。鹿特丹一个建筑物的墙上有他画的巨幅壁画——囚于监狱中的天使望向铁窗外。画面上按顺序书写着历届诗歌节获奖诗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在上面（诗歌奖授予我纯粹是我的幸运）。揭幕仪式上，我看见他爬上高高的梯子，把当年得奖诗人的名字添上去。他有一个受难者的形象，自身的痛苦经历使他对域外中国诗人的处境表现出特殊的关切：

在回答你们提问的同时，我不禁也想问一些问题，如：你们在国外写作有何种感受？流亡作家中是否有组织？想象的读者是否中国人？作为流亡作家是难过的还是一种刺激？我想在国外不仅是让人难过的，也是尖锐的，使语言更加锐利。我希望中国有变化，符合人们的理想。现实最终追上暗喻。

这次诗歌对话的纪要就是以布莱登巴赫“现实追上暗喻”这句话为题发表于《今天》1992年第四期。之后在巴黎，我与旅法女学者张宁在蓬皮杜中心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对布莱登巴赫做过一次专访，也曾在《今天》刊出。诗歌节期间，多多和北岛采访过美国诗人阿什贝利；张枣则采访了俄国诗人艾基——他的几首在翻译工作坊

译成中文的诗，集成一个小册子（有王家新、洛夫、我与贺麦晓合译的几个版本），深受大家的喜爱。其中一行“喂—胡桃树”像一句口令在我们中间流传。张枣8月初给我的信中谈到那次采访：“病了好几天，拖得现在才交稿，很不好意思。……Aigi的采访录我个人还算满意，也做了一些调整和处理。他是大师，有幸聆听他讲诗，尽生都会受益。”1994年12月，艾基应法国蓬皮杜中心《说》杂志（les Revues Parlées）邀请来巴黎，我又一次见到他，并参加了该杂志为他准备的诗歌晚会。正值他编的《楚瓦什诗选》在法国西尔塞（édition Circé）出版社出版，楚瓦什共和国电视台还派来了记者。我们去圣日耳曼区的桅楼书店，到寓居巴黎郊区的一位崇拜艾基的俄国画家家里做客，我曾向那位记者表示今后将继续翻译艾基的诗。直到2006年2月，我从北岛那里得知艾基突然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对自己未能兑现诺言深感愧疚，我写了一篇论艾基诗歌的文章，赶译了一篇他的诗论，与北岛的回忆文章和一首献诗一道在《今天》做了个纪念专辑（2007年第3期）。这是后话。

一开始《今天》就得到海外作家的积极呼应，尤其老《今天》诗人依旧热情地投来新作，这保证了当代诗歌精神的延续性。多多的《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在这样一种天气里来自天气的任何意义都没有》，杨炼的《恨的履历》、《无人称的雪》，顾城的《城》，或处理当下的经验，或追忆故国，语调中都充满悲怆，死亡的意象纷至沓来，现在读依旧令人动容。鉴于众多作家的出离，他们在异乡的生活和写作必然使当代文学的观念和气质出现新的变化。解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能否产生期待中的自由诗篇？写作能否在心灵的内在空间中更深地拓展，抵达真实的自我？更重要的一点，写作场域的变化造成的东西方文化的心理落差，能否在感受和思想层面激发出自1949年以来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相当陌生的流亡的现代性？北岛早在1991年就敏感到国际文学的背景带来的新挑战，他在改变开本的3、4期合刊的《致读者》中写道：

由于舞台的转换，许多中国作家已经处于国际文学的涡流之中。而多种文化的撞击与交错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文学的格局。我们应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关注港台等地区华语文学的发展。

……我们仍强调诗歌在文学中的先导作用，刻意于语言和文学的实验性，把更多的篇幅留给那些无名而诚实的探索者。

他还不无风趣地提醒说：“文学用不着和权力比寿命。”意即文学应该做自己的事。然而就一个严酷的时代而言，权力的寿命往往长于文学，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涂掉文学的印记”。我想“流亡心态”是值得探究的，呼吁从中解脱出来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流亡时限的茫然无期必然导致某种封闭性，它既是一种宿命，同时可能转换为退藏于密的自觉。这其实已经被包括北岛在内的一整代人漫长的流亡写作生涯所印证，我再次想起布罗茨基的比喻——“密封舱”，它既指流亡诗人同母语的先天关联，又指朝向不确定性的离心运动。当然，北岛的初衷是流亡写作应该保持主体的开放姿态，应该具有世界文学的视野，这无疑是积极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办刊方针的调整，改成32开本后的《今天》至少有几层变化。首先，改变了原刊给人留下的多少有点临时性的印象，其次，容量扩大使刊物厚实多了，增设的

新栏目和专辑提高了学术性，例如，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讨论，“重写文学史”，以及围绕所谓“世界诗歌”展开的争论等等。透过奚密等学者的研究，港台与华语文学在《今天》上有所介绍，李欧梵的《狐狸洞诗话》不定时连载，既谈读内地诗人的印象，也涉猎华语诗人和外国诗人，如也斯和安格尔等，我就是从他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说从印尼逃亡美国的华裔诗人李立杨这个名字的。早在1994年，《今天》就策划在1995年春季号上做一个香港文学专辑。9月28日林道群给我写信提到“明年NO.1拟弄的香港专辑，确与也斯谈过几次，正在组稿，希望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出来。”

关于《今天》如何办，北岛无疑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批评的声音不时传到他的耳里，我记得顾城给编辑部写过一封措辞相当激烈的信，批评《今天》“有一个总的倾向，就是‘太专业’”，还将《回答》中的著名格言句做了颠倒性改写，那封信以读者来函方式照登了出来。我想顾城希望新《今天》不要失去老《今天》的精神并没有错，私下里他还是希望他的诗能得到同行的认可。1992年7月初，我收到他的来信：“回到柏林，看看诗还是想寄你一些，好像是缘了北岛说过一句：《城》有前言才更明白一些。《城》是梦中之象。……前言是一个入口。”组诗发表时是附上这里所说的“前言”的，但当时我作为它的读者，哪里能够明白他扑朔迷离的词语中隐含的谏？他说《城》只作了一半，还有一些城门没修好，是否之后的《鬼进城》即这组诗的另一半？我记得他也寄给了我，但直到1993年他在新西兰的激流岛去世，这另一半才在纪念他的专辑上发出来。北岛写了编后语，语词凄切地称死者为“船长”。我新近读到杨炼的《本地中的国际》，他在文中写到顾城：“他的悲剧，集历史的遭遇和写作的困惑于一身。他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鬼进城》，与其说是新的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现实‘连贯性’的崩溃。我能清清楚楚感到那崩溃背后的一种寻找。诗人得找到一种能够归纳现实的形式，以使自己的语言一和自己一活下去。”顾城的悲剧对我们这些在国外的同行刺激非常大，张真最早从美国打来电话，接着北岛、张枣、胡冬……我在脑子里搜索他的形象：文弱、病态、戴着一截裤管改制的高帽、眼睛充满对世界的惊恐。在赵毅衡家的晚会上，他悠游于每一个房间，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在伦敦大学演讲时他先在门外的雨中立一会儿，然后进来侃侃而谈，说起雨中土地里的姜，那种乡野的诗意。顾彬在听众席上情不自禁地对他的汉语发出赞叹，他梦幻般的说话方式确实很有感染力。在鹿特丹发生了一件事，他和谢烨的房间被人撬了，丢了不少钱，诗歌节主办方感到抱歉并出面做了赔偿。他们俩像一对鸳鸯，总是形影不离。多年来我未能破解一个公案：如何是“杀人是一朵花”？翻译家刘长缨从新西兰来巴黎时，我问过他事件现场的一些细节，他是去帮助料理后事的人之一。某一天我恍然大悟，写那句诗的人早已精神分裂——他不过是另一个阿尔都塞。

流亡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乡愁就有多重。“连贯性崩溃”在生活 and 写作两个方面是同步发生的，在那种情况要下活下来而不发疯是困难的。不管你是在激流岛、冰岛、还是曼哈顿，其实都是在极地，而且那极地正如策兰所说：“在我们身内/不可逾越。”柏桦97年在柏林住了两个月，来巴黎时一见面就对我说：“我知道了，在外面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了。”我想柏桦体验到的不仅是孤寂，而且一定还有不在家的游魂感、时差感、晕陆感。如果没有在途中建立的友谊，没有诗歌，我们这些“迦陵频伽共命鸟”要熬过一个个难关生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要感

谢《今天》，它是能量的中转站，一件件来稿、一封封熟悉或不熟悉的作者和读者的信，都给我提供了热量，我是把它们当作家书来读的。而每当从编辑部转来的自然来稿中发现一首好诗，不知怎么，我会感觉松一口气，因为从一大堆纸张里要挑出一首像样的作品简直如大海捞针一样难。由于《今天》在国外注册出版，许多作者对它的性质不很了解，不敢贸然投稿，是缺少好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也很自然，谁也不能要求人人都具备在内心免除恐惧的勇气。早先与《今天》有来往的国内作者，一旦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恐怕连继续发表作品的机会都会丧失，这种威胁至少是潜在的。李亚伟的《我们》、万夏的《蝴蝶》和《铁皮》、周伦佑的《果核的含义》在1992年第一期《今天》上发表时，他们三位都还在狱中，而他们的稿子或通过友人传递、或从大陆民刊选载，《今天》的声援对于改变他们的处境当然是微不足道的。1997年巴黎的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邀请陈东东和朱朱参加，他们俩均因故未能来。朱朱据说受民刊《北门》调查事件的牵连；陈东东出事时我不知情，给他家打电话，她妈妈一听国际长途，根本不敢吱声，只能谎称“他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写东西呢”。诗歌栏目一直是《今天》的重点栏目，为了保证质量，就不能指望单纯从自然来稿中挑拣适合标准的作品，张枣和我都意识到主动约稿的必要性，我们各自给熟悉的诗人写了信，邮路有时通畅有时不通畅。不管怎样，九十年代以来的不少当代诗歌的重要文本得以陆续在《今天》发表，编者只是穿针引线的人，《今天》本身的象征性和感召力是历史赋予的，它最初的鲜明立场是使它赢得共鸣和信任的基础。一份杂志既是一个当下写作的现场，也是一个未来考古学的现场，因为《今天》的特殊位置，某些有待挖掘的东西被保存了下来。钟鸣把正在写作中的长诗《树巢》（第一章《裸国》）交给《今天》（1992年第二期）发表时，附有一段引言，能够说明当时国内的精神氛围和文人处境：

这篇纯粹的精神回忆录将为准备鼓起勇气理解《树巢》的人们所写，它将阐述一种隐藏的诗，诗学的政治地缘学，和汉族“固化历史”的出现。它绝非为愚众所写，也绝非为诗界——我称之为“畜群诗人”所写。

陈子弘认为《树巢》“在汉语诗歌的规模及语言密度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史诗是一种宗教吗？》，见《今天》同期），我觉得《树巢》在形式上是当代难得一见的、不同文体混合而成的泛诗文本，它将寓言叙事的方法引入习惯以为只适合于抒情的领域，将神话、历史和精神史的碎片粘合起来，对导致历史固化的顽症——“汉族的自我攻讦”进行了庄子式或鲁迅式清理，从诸如“人们宽宥了自己，也宽宥了帝王和罪人”的注释中业已透露出“愚众”毫无觉察、狐媚者故意回避的重大主题。而他的《中国杂技：硬椅子》是对权力和色情、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隐秘关系的寓言式解构，温迪·拉莘（Wendy Larson）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唯美与色情情调》一文中有细致的分析（张枣译，见《今天》93年第三期）。陈东东的《流水》、《解禁书》；西川的《鹰的话语》等诗歌都属于开放性的跨文体实践，《解禁书》更是将一个“反迫害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的隐微文本。陈东东给我的信中透露了那首诗的本事，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引用。

在巴黎的头两年，在一小段兴奋期过后，尤其是长子出生后，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白天紧张地学习法语，夜间需要照料孩子。在医院里，护士每隔十五分钟

就要查房一次，病房里永远亮着灯，所以孩子的睡眠极浅，有时我刚迷糊睡着，又听见了哭声。支离破碎的夜晚、不断的噩梦使人精疲力竭，不知何时开始，我脑子里出现了种种奇怪的幻觉，很可能国内的经历也在无意识中泛起，开始对我施行报复。同时，我大哥在福州的病床上被庸医长期误诊误治，生命危在旦夕，凭国内医生的门诊单法国的药房不认，所以买不到药，我只有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我极度敏感，觉得自己受到监视，遇见警察时我的目光带有挑衅性，有时乘地铁我故意逃票，已获得某种心理满足。有一次在移民局办证，大概是排队时显得不耐烦，女办事员故意刁难我，说我材料不齐，让我来回跑了好几趟，结果我的自我防卫意识被激发得过了头，有悖外来移民应该有的谦卑和隐忍。我大量写诗，读克尔凯郭尔，对蒙巴那斯的“蜂巢”艺术家的生活及其入迷，尝试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一周内写五百行诗，差点儿崩溃。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老木，他就是继顾城之后精神崩溃的又一个不幸的流亡者，1985年他在北大编过两卷本《新诗潮》诗选，影响很大，他还是我的同代诗人中热衷于联络各方诗派的活动家，89后在朋友的帮助下秘密逃亡法国，参加过《今天》复刊的大会，还会率领海外作家团访问台湾，也曾与孟明、张亮和我策划在巴黎办一个文学刊物，但他的精力几乎全扑在海外民运上，根本无暇写诗，于是酝酿一阵后刊物就流产了，连一期也未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1995年10月，他已经精神失常，蓬头垢面，一只眼睛可能是被殴打致充血，红肿得吓人，他不承认被人打了。我猜想他生病的主要诱因是女朋友的突然离去，生活陷入了绝境，在他的病情还不太严重时，我劝他暂时去熟人的饭店打打工，然后再图生计，他断然拒绝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不管怎样我还是一个诗人”那句话时的神情。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病后仍未失去骨气：我听说有人胁迫他在一张纸上签字，并允诺送他回国，他看了看那张纸，把笔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北岛每次过境或来巴黎小住，我们都会争取见面的机会。第一次就是在老木家，那天在场的还有马德升、孟明、胡冬和他的夫人凯特，马德升是老《今天》时期的艺术家、“星星”画会的重要成员，也写诗并在法国出版过诗集，他头颅硕大，眉骨突出，长得像贝多芬，脾气大得连死神都要敬他三分，他顽强地活下来靠的就是脾脏里的乾坤之气。一些老朋友怕挨骂而躲开他，其实他内心悲凉，对友情很看重。他和老木因一个原则问题发生了争执，老木的自我辩护显得缺乏常识而节节败退，最后痛哭失声，于是大家不欢而散。有一次北岛从荷兰来看我，我约他在我们常去的塞巴斯多波尔勒大街的一间咖啡馆见面。他说他收到我的一封信，打开后发现信封里什么也没有，他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其实我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留意，丢三落四、南辕北辙在我身上经常发生。我不记得是否告诉北岛，实际上我去看过心理分析医生，名义上是陪我儿子去的，可能医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导致孩子一度有强迫症行为：他每走几步就要看看鞋底是否踩到狗屎——十多年前巴黎的遛狗人还不太意识到需要自己动手清理宠物留在公共空间的秽物。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这几天我翻检出一些旧信，其中一封1992年11月12日写给张枣的信（我留了复印件）是这样开头的：“最近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我感到体力和脑力都有所不支，由于日夜被种种幻想所纠缠，我甚至担心自己会突然发疯了。这断然不是通过自我暗示产生的，而是强行记忆的压迫，它使我再也不能把虚无和现实有的分开。我很想找一个人谈谈……，但没有人，我只能不断地跟另一个我对峙下去。我还闹出了一个笑话，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我居然跟她谈了足足四个小时，全

是我们在说话——太可怕了！”张枣的情况怎样呢？我还没来得及了解他，因为我们还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我期待着有那么一次会面。不久后我读到他1992年写的那首《夜半的面包》，首句即是“十月已过，我并没有发疯”，我骇然于他的灾难体验和转换能力。1993年1月我收到他的回信，他并没有谈自己的生活，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回应了我：“这回我之所以一定等打印好是因为每次刊我的文字（国内亦如此），错字蜂起，令我心惊肉跳，真是会短我几年阳寿。你知道我们宁可忍受生活中的漏洞百出，文字上出错可真令人尴尬。”他觉得“唯一的结果 / 未露端倪”，他在等待，在孤寂中熬炼着，他关心的只有文字的黄金。北岛与我分别后，对我依然不放心，3月初我收到他写给所有《今天》编辑的工作信函，下方他留给我一个简单的附言：“我计划四月中旬在张枣那里开一次关于诗歌的编辑会议，只我们三人。你觉得如何？”

4月13日我从巴黎东站出发去特里尔，那是我第一次去德国。火车经过南锡后几乎一直与莫佐尔河形影相伴，时而会合，时而离开。我在车厢里边听音乐边欣赏美景，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零星的感受。火车靠站时，张枣已经在月台上等我。他上来与我热情地拥抱，我们步履轻快地出了站。大学在郊区，进门前我们先去小超市买了一箱啤酒。张枣在特里尔住了七年，已经养成深夜独饮的习惯。我很快见到了李凡，那时她和张枣还没有结婚，她是上海人，听说我在上海生活过十二年，所以像遇见老乡一样格外亲切。张枣亲自下厨，他烧得一手美味的湖南菜。我们热烈地交谈到深夜，外面下着很大的雨，第二天我在给妻子的信中谈到我的如同巴山夜雨的第一个德国之夜，我将这次谈话吹嘘成“新诗学启示录”。接下来的几天，张枣陪我参观了“拉丁黑门”（即罗马门）、大教堂、圣母塔，在城里闲逛。当然没有错过去马克思故居，出乎我意料的是，曾有那么多朝拜者来自万里外的中国，他们在留言簿上写下种种感言，竟占据了一大半页码。一些看起来很虔诚的话其实幼稚得令人发笑，我们的同胞（其中多数应是官员）把这位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德国人当作神，其实对他的思想又了解多少呢？我想没有什么比对他的暴力学说的片面运用更加可怕的了。“爱”这个词被流放，而“恨”却到处滋生，以致一切价值都被颠倒了（此刻我想起北岛有句诗——“我们的心走得比恨更远”）。张枣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能够结束恨的历史，至少在文人生活中可以努力去营造一种轻松自然、相互赏识的气氛，恢复古代的知音传统。我们与文革红卫兵一代不同，接受过学院训练，知识结构更加完整，但作为迟到者却没有优势，因此绝不能像瓦雷里那样停止写作二十年，要意识到时间紧迫。《今天》的意义是呈现和容纳有差异的先锋性，而不是排斥差异性。读了我的那首《写作狂》，他对“在暗室里工作到天明的摄影师”那个比喻很感兴趣，他说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与显像的过程颇为相似，因为任何瑕疵两者都不能忍受。另外，诗人都是写作狂，从空白到显像已然是死亡，词语和我们最终都得交给“死亡”去冲洗。可能那时他已经在思考写者姿态的问题，几年后的诗学文章《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中，他肯定了“写作狂”对空白的不妥协：“写作狂作为一种姿态，是迷醉于以词替物的暗喻写作的必然结果。中国当代诗歌正理直气壮地走在这条路上。”（该文曾在《今天》发表，但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我们谈到法国和德国气质的差异，谈到歌德和席勒的友谊，还有我们共同喜爱的荷尔德林，谈到巴黎——他对这座城市充满向往，但还从未访问过，我向他发出了邀请。1994年他第一次到

巴黎，那是在写出《跟次维塔耶娃的对话》组诗之后。有一次在露台上说话，他的德国同学马丁听说我在巴黎生活感到非常羡慕，而我对他说，巴黎的一切差点把我压垮了，我经常求助于里尔克，通过阅读他获得能量。一周后北岛也从荷兰莱登来到特里尔，张枣的一个朋友安排我们到附近的一个“磨坊”——艺术家旅馆去。朋友开车送我们，在山谷里转悠，终于打听到一条通往神秘峡谷的小径。被问路的当地居民诧异地打量车中的人一到“磨坊”去的多数都是些行为怪异、不合时宜的家伙。女主人五十多岁，与人合资改造这个旧磨坊，因合作者撤资，经营不下去且所有权归了国家，她自己便从主人沦为了实际上的房客，但她性格开朗、洒脱、喜好结交，于是这里渐渐成为外来艺术家的庇护所。我们在此度过了难忘的三天。上午讨论《今天》诗歌栏目的规划，下午沿着峡谷做长时间的散步，夜里饮酒、唱歌、即兴赋诗。女主人颇有女巫气质，我去外面给壁炉取柴回来，她指着我对张枣和北岛说：“他取木头时脑子里一定想着星星和火焰的隐秘关联”。告别的前夜，我们把已经睡下的一对俄国夫妇歌手叫醒，要与他们比赛俄罗斯民歌，结果令他们大为惊讶，因为我们会唱的比他们还多。男歌手对北岛的男高音赞不绝口，听了《满江红》，他亮出手臂说，上面的每一个毛孔都放大了，把我和张枣都笑翻了。他认真地对北岛说：“你不唱歌剧太可惜了！”殊不知北岛早年就正式学过歌剧。女歌手的歌声飞上夜空，在峡谷回荡，搞得我们神魂颠倒，那一夜她的美丽彻底征服了我们，她摇身一变，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为安娜、冬妮娅、喀秋莎……

这次小型会议和六月下旬《今天》编辑部与捷克地下文学刊物《手枪评论》

(Revolver Review) 联合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93年第三期的“诗歌专辑”以及“译诗”和“诗评”。诗歌内容占了将近200页，是《今天》规模最大的一次当代诗歌荟萃。翟永明在纽约的新作《咖啡馆之歌》、欧阳江河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胡冬的《李白与杜甫》、杨炼的《冬日花园》、柏桦的《现实》、西川的《夜曲三章》、吕德安的《解冻》、钟鸣的《遥远的星光》等作品构成专辑的坚实部分。瑞典当代诗抄（李笠译）、美国当代诗抄（坚妮等译）、法国当代诗抄（尚德兰、北岛译）中的作品大都是首次汉译。同期刊出的欧阳江河的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梳理了当代诗歌写作的若干诗学问题，是一篇在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一定程度上，它为九十年代国内强调知识分子身份的诗歌写作定了调子，很可能也是导致后来“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诗人”之间争论的导火索。《今天》编辑部收到过一些参与争论的文章，发过一个征稿启事，希望有反对意见的回应。但一方面因为《今天》不在现场，对事件本身的了解不够具体；另一方面，考虑到《今天》的编辑策略是“对不同诗人特殊性的尊重”，尽量避免门户之见，最后并未刊出这方面的来稿。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和民间并不存在立场的对立，两者之间也无所谓话语权问题，差异主要在于对语言的态度，而这方面可惜未见更具深度的探讨——可能我自己的视野受到远在国外的限制。同期陈建华的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写于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期间上海“地下写作”的一段史实：一批诗人被当成“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朱育琳被红卫兵严刑拷打后死于非命。文中一句“趣味对我们具有追寻身份认同的意义”使我联想到美学分歧往往导致政治分歧，无产阶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资产阶级趣味，所以一律要加以“扫除”。朱育琳翻译得很出色的波德莱尔的《恶运》，不可思议地成为他和他的诗人伙伴自身恶运的一个象



征。作为《今天》的编辑和作者，张枣和我深感超越个人趣味，倾听他者声音的必要和困难。张枣就曾表达过“一个作家在阅读和试图理解另一个作家时所遇到的难度是惊人的。常常他会完全不理解另一个众口交赞的作家，不能接受他为何那样写，用那样的语气说话，用那些自己从不敢用，也从不愿意用的词语来营造意义；换言之，他会本能地排斥另一个作家的最优异处——他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今天》杂志的编辑面临的是一场冒险，因为编辑者自己都是作家。”（1993年第三期“编后语”）编者应该成为倾听者，成为优秀诗人和作家的知音，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类型和风格的写作——至少我们是这样自我期许的。总体来说，我们鼓励纯正、大度、体现汉语诗性魅力的作品，反对写作态度的玩世不恭。

我和张枣约好一道去捷克，我先到他那儿，带上我收到的稿件，汇合他手边的备用稿，用两天时间编好上面提到的诗歌专辑，然后从特里尔坐夜火车，25日早晨抵达布拉格。这样，分手两个月后我们又和北岛会面了。我第一次见到了万之，还与李欧梵教授意外地重逢（1986年和1987年我们在上海有过两次会见、长谈，通过信，我还保存着他送给我的英文版金斯伯格诗集）。“天鹅绒革命”后的布拉格生机勃勃，据说有数万美国青年带着朝圣的心情奔赴这第二个巴黎，希望成为艺术家。我们在一幢迷宫般的建筑物里找到《手枪评论》编辑部办公室，几乎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书籍、杂志和稿件。李欧梵深情地回忆起他和他的老师、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Průšek)的学术交往，北岛、万之与《手枪评论》编辑马丁·哈拉交换了办地下文学刊物的经验，《今天》与《手枪评论》曾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如今的境况却大为不同，后者浮出了地表，前者流亡他乡。晚上在地下酒窖里的诗歌朗诵是点着蜡烛进行的，北岛读的是《布拉格》，张枣读了他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再由一个声音沙哑的美国年轻诗人朗诵诗的英译，在场的听众反应热烈。我没有现成的英译诗歌，幸亏李欧梵教授救场，将那首朋友初译的《她把头埋在青铜的人马兽肩上》仓促修正，总算应付了过去。三天里我们走遍了布拉格老城。帝国城堡、卡夫卡故居、犹太墓地……傍晚时分寻找卡夫卡墓，因关了门只在铁栅栏外远远地望见他那永恒的居所。女汉学家奥尔加(Olga)请我们听歌剧，金碧辉煌的歌剧院里正在上演莫扎特的《唐乔万尼》。我记得走在街上时她问我们几个“为什么写作？”，不记得别人怎样回答，我脱口说出“为几个朋友”，万之似乎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我自己也觉得这并不全面，但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万之在《也忆老〈今天〉》文章中谈到回忆的性质：“每个人的回忆都是个人自己的回忆。受到自己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和干扰。这会使我们的回忆发生误差，在自己挖出的这些历史碎片上涂抹上一些本来没有的颜色，历史就不免变得虚伪起来。”（《今天》2001年春季号）回忆是对已逝之物的召唤，个人记忆带有选择性，难免出现误差。本雅明就认为“已然开启记忆之扇的人永不会到达记忆片断的尽头，……而真实只存在于折叠的记忆中。”（《柏林纪事》），历史的虚伪必产生于有意的遗忘，或有意的遮蔽。但对于个人而言，回忆是一种治疗，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被时间之流打成碎片的内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不幸的人往往通过回忆重拾生活的信心——它需要直面真实的勇气。记忆是诗歌之母，文学和诗歌的游戏与虚构不过是为了给记忆戴上花冠，但记忆的眼泪是不能虚构的。当我凭借编辑之间、编者和作者之间的通信找到一些时间和事件的线索，我发现记忆形式的自我驱动使很多个人的情感意象和细节从扇子的折叠处跳了出来，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尽量围

绕《今天》，暂时不去打开别的扇面。循着万之文章中提及的“《今天》编辑部的第一次分裂”，我的思路也回到了新《今天》的人员变动。据我所知，除了万之，复刊后的《今天》编辑基本上都是北岛邀请的，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的，各有分工，却没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一些编辑（包括万之本人）后来离开了，除了个人原因，应该存在着观念差异的因素。北岛本人做过努力，他私下里经常和我讨论某一期的质量问题，电话或通信中也总是直言不讳地对对方的诗歌提出批评与建议，差不多每年年终他也会给大家写信，做一下年度总结，而他自己作为诗人，对于“行政管理”似乎感到不适：“每次写这类信都发怵，好像向组织上交代问题，可总也说不清楚。如果有钱，我们真应该开个编辑会议，把种种疑惑、问题、建议，拿到桌面上来讨论。”（97/12/21）尽管有王渝、顾晓阳、王瑞云、肖海生先后出任编辑部主任，《今天》的主要栏目还是北岛和李陀设计的，如“重写文学史”、“文学以外”、“今天旧话”、“汉语与写作”等，是深具文学史视野和使命感的，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回应，也为后来出版的《今天丛书》提供了条件。北岛一直在谋求变化，希望刊物注入新的活力，而有时力不从心。1994年4月，《今天》编辑部在纽约开了一个规模最大的编辑会议，所有同人悉数到场，行前北岛要求每个人准备一个书面报告，会上分给大家阅读，可见他期待达成最大共识，以便协调行动的决心。那次会议可谓盛况空前，编辑之外，许多《今天》的作者和读者从欧美各地前来，人数绝对不少于兰亭修禊。我记得的诗人就有胡冬、欧阳江河、杨炼、雪迪、杨小滨、虹影。石涛将刚出版的《倾向》创刊号带到会上，发给大家，我翻看了目录，觉得颇有一股锐气，尤其专辑部分是花了功夫的，建议编辑会上评估一下它的内容，讨论一下我们的对策，不过诸位同人似乎对《今天》信心满满，并不担心来自同类刊物的竞争。事实上《倾向》办了数期后未能坚持下来，我为之感到惋惜，而《今天》存活至今，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我依旧想说，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幸事。

有一回，李陀、格非、欧阳江河和我一块去住在北京西郊的北村家里做客，李陀建议在《今天》上做个“文学和友情”的专辑，大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个想法后来在“中印作家对话专辑（二）”中实现了（见2010年秋季号），并通过在中印两国之间互访的对话之旅将之扩展到了跨语言、跨国际的文人生活中。虽然我没有参加那次活动，但那些表达高山流水的文字让我珍视。友谊这个与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主题，曾经在中西方文学史上留下许多传奇，不也在我们这一代文人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吗？《今天》漫长的历程见证了知音传统依然是活的，见证了文学这个公器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每个人。从它创办开始，已经有好几位同人离开了世界，他们的奉献已经成为《今天》的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2006年3月，在时隔十二年之后，《今天》编辑部才得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再次聚会，张枣、南方和我因各自工作或生活的原因，未能成行，而四年后张枣君竟早早谢世，从此这个世界更空旷了。读到谭嘉的《〈今天〉25周年庆典结束语》（2006年夏季号），想起共事这么多年来，我和她仅在纽约见过一会议间隙与她单独聊了一会儿，她的优雅却一直保持在我的记忆里。就在两星期前，北岛打电话来约我写这篇纪念《今天》的文章时，我还告诉他我在一本书里偶然发现了一张小纸片——谭嘉寄编辑费时附带的便条，上面写道：

宋琳先生：谢谢你为《今天》编书，费心了。书出来后希望卖得好。

祝秋安。谭嘉 1999/9/27

她提到的书指的是《今天》十年诗选《空白练习曲》，张枣与我合编，作为《今天》丛书之一，2002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五十位诗人的近二百首诗，从九十年代全部《今天》诗作中遴选出来，我们希望它能体现国内与国外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最高水平。我们更重视文本，而不太考虑作者的名气，所以一些边缘地位的诗人也占有一席之地。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程度上还代表了另一个九十年代：流亡的、寻找本土现代性的、肯定精神价值和相信心灵救赎的、寂寞书写的九十年代。它勾勒出了诗人在一个物质主义盛行时代的灵魂状态，他们的挣扎和斗争，他们的不妥协。当然，它也浓缩了张枣和我以及《今天》所有同人多年合作的经验，它毫无疑问是友谊的结晶。

2008年12月在香港，《今天》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老《今天》的同人芒克、严力、徐晓、鄂复明等都来了，有几位前辈我是第一次见，大家洒洒祭奠死去的周郿英、赵一凡等前驱。与王渝阔别十四年，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欲说还休。除了添了些白发，她没有变。当年她去大陆见一些诗人朋友，写信来，对他们“生活很艰辛，仍然执着于诗”（1995年9月5日信）的处境非常关切，除了编散文，定期向我催稿，她给“诗与诗评”栏目推荐了不少好稿子，她似乎永远地葆有热情——“我依然在为文学杂志《今天》做编辑的工作。我仍继续在编辑《人与人权》这份季刊。……你们——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从来向往加入的是诗人的行列。”（96/12/10）而她是具备着诗人的本色。顾晓阳没来，我在北京偶遇他，依旧笑呵呵的，有需要，他会为朋友拔刀相助，也是因为这种品行他才与《今天》结缘的吧。王瑞芸终于赶来了，我在回国前与她共事六、七年，居然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起初我在新加坡，后又去了阿根廷，她则住在美国加州一个叫千橡城的地方。因我的土星性格给她添了多少麻烦啊！而张枣也是出了名的散漫，经常如他所说“漏洞百出”。有一次他把编好的稿子寄给王瑞芸，结果她根本没收到，而且还没有存底，王瑞芸急得要命，又打电话又发传真找我“救急”。另一次，她知道我要回国，怕我耽误，便发来了“最后通牒”：“

稿子（三期）等不到七月。我向各编辑约的是五月上旬交稿，因此你还是得在回国前编好。甚至不是编一半，而是全部。回国约稿固然好，但时间等不得，你回去先得休息，会朋友，侃，然后才能理到组稿的事。会不会？所以劳驾你辛苦，走前赶出来。倘若国内组到好稿子，寄我，临时换上去也是使得的。（2000/4/17）

是的，当然使得。但如何保证组到的稿子不会秘密地丢失呢？那次果然还是遇到了问题。四年前，我为《今天》创刊三十年写了简短的感言，抄录如下：“1978年12月问世的《今天》作为一份民间文学刊物，就其迅速形成的广泛影响而言，标志着文学反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时代的和人性的吁求。《今天》一代属于文学的英雄一代。如果说早年的《今天》预示了此后三十年汉语文学的变化，那么1990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是这一变化的历史见证，尽管现今的世界整体上不利于文学，

《今天》依旧守护着诗与文学这一心灵的净土，并致力于使伟大的事物复活。”在《今天》第 100 期出刊之际，我的感言要稍短些：

作为《今天》的同人，我希望它更加开放，更少偏见，不失风骨，以虔诚和艰巨的劳作，为汉语文学赢得更久远的美名。

2013. 3. 30

## 座中多是豪英

——《今天》100 期憶舊

林道群

1990 年《今天》（總第 10 期）在北歐挪威復刊，我人在香港中文大學編一本叫做《中國語文通訊》的雜誌，並參與籌辦《二十一世紀》。當時流亡在海外的朋友出版有各種各樣的刊物如《廣場》、《民主中國》等等，《今天》復刊我們在香港略有所聞，但一時沒有機會看到雜誌，其間沒有連線沒有交叉。後來看到復刊號，編委成員很多都是著名作家，但只有李陀、黃子平和劉小楓是見過面認識的。怎也沒想到，隨即不久，《今天》會移到香港印行，更難以想像的是，此後從總第 11 期至這本第 100 期竟都由我經手印行（除其間三年一度在台北印行外），前後足足跨越逾二十年。

最近這幾年跟北島、李陀碰面、通信，一談起《今天》，他們總嘖嘖稱奇，覺得真真不可思議。二十餘年如一夢，杯籌交錯酒意朦朧，很多人很多事都記不起來了。北島說我最後生，命我不嫌瑣碎把記得的整理出來。其實一本雜誌，誰來編，怎麼編，編些什麼，甚至出版經費怎麼籌來，才是最重要的。好在除了張棗，前前後後參與《今天》的編輯們都在，他們來寫那些最關鍵最靈魂的部分。我做的只是後勤，雖無關重要，好在維持時間較長，又因天時地利，都在香港，大多數都是印製方面的雜事，無關宏旨，但記錄了在海外辦刊物的艱難。只是記憶其實也頗為政治化，一百期特刊本身就很風光，我的記憶有點酸的饅頭。比如就說最起碼的《今天》編輯部，其實沒有一個編輯部，就算這幾年北島來了香港，全力承擔起主編工作，但編輯部也只是一個郵政信箱而已，好在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所有的策劃和編務，可以在雲端運行，不像二十年前，編輯之間有賴飛鴿傳書，文稿、雜誌都要郵差先生代勞親送上門。

萬事起頭難，在此記錄的多是《今天》剛來到香港時的情況。

二

1989 年劉小楓、甘陽去國留學，留下近百部「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組譯的書稿，蘇國勛、孫依依和王煒因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計劃停頓，怕耽誤譯者的心血，輾轉送來香港，寄存在我家，另謀出路。我們在港台多方聯繫，想在海外繼續出版這系列叢書，大半年不得其果。1990 年，我和人在瑞士的劉小楓、人在美國的甘陽決定，在香港自己註冊一家「社會理論出版社」，並開始出版「社會思想叢書」。那時我全日打工上班，他們倆根本人不在香港，說是自組一家出版社，只是一種姿態而已，哪能真的運作起來。1990 年秋天，在巴塞爾讀神學的劉小楓來信，說在歐洲見到北島，並給我寄來他有份參與編委的《今天》雜誌復刊號（總 10 期）。

《今天》復刊號印刷精美，但植字、排版是當時很普通的家用式打印機點陣打印，看起來顯得簡陋，那是北歐欠缺中文排版客觀條件所限。後來萬之（陳邁平）跟我說，中文環境限制固然是，最大的困難還在於，北歐挪威的印刷成本極高，郵寄費用奇昂。1990年8月創刊不久，9月初劉小楓寫信問我，既然我們自己有出版社，把《今天》接過來做如何？

《今天》之事我已囑北島直接與你聯繫。但《今天》之發行不宜代理，不然太麻煩。你忙不過來。（1990.9.18.）

《今天》之編務，我不同意你幹，你太累。可由小李幹，他也愛文學。編委中，我的名字印錯，但我希望錯下去，以應付共產黨的中宣部。（《今天》復刊劉小楓印成劉曉風）（1990.9.24.）

當時我並不太了解《今天》，北島比《今天》名聲更大，八十年代初我讀書時，曾經因為要找北島的詩，發現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期刊室有一套《今天》複印本，只是七十年代末內地的民刊不少，中大學生會當時就編印有五百多頁厚的《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記得看到《今天》時並沒有異常的激動，直到中大出版社印行《波動》（後來才知道那也是北島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書）。

甘陽專注他的學術，一直不太贊成我把時間承印這種文學刊物，我和淑娟回劉小楓信同意接手《今天》的原因，現在想不起來了。用今天的術語來說，那不折不扣是一個粉絲的生理反應，當然說是八九後的一種綜合徵候也無可厚非。正式的第一次接觸是人在斯德哥爾摩的萬之 1990年9月24日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先生來電告訴我，《今天》在香港編排付印等事要和您聯絡。此事劉曉風[小楓]也一定已和您談過了……我們《今天》編輯部就設在我任教的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地址電話等全印在信紙上了。

按照以下萬之的回信，我是10月3日回信同意在香港接手編印《今天》的，因為萬之10月11日的信是這麼說的：

10月3日來信收到，深謝您對《今天》的支持和鼎力相助。您所開列的編排印刷等價錢，對我們是很合適的，問題是我們的印數不是2000，而是2500-3000，字數是十二萬字左右……我們的業務經理夏精文因事去港，可以順便和您面談，如有簽定合同等事項，我和北島已同意由他全權處理。<sup>1</sup>

<sup>1</sup> 我手頭保留着一份1992年9月10日由孟寧和陳邁平向基金會作的財政報告。一開始是這樣的：「《今天》於1990年第二期起改在香港排版印刷(包括郵費1000美元)。一開始採用承包辦法……總計每期5000美元。自1991年第二期起由於雜誌重量增加，郵費超支至1500美元，因而改為5500元。」這種承包關係，其實很快就不一樣，根據我保留的1991年12月15日給萬之的信：「那一期的開支是植字排版HK\$12,000，印刷HK\$19,000，郵費HK\$13,000。」加上勞務費和封面設計費等，已超出了預算。到了1992年，據說因為財務不夠清晰，引來了非議。詳情我並不了解，據保留的書信記錄，1992年7月21日我遂寫長信向萬之交待和解釋，並請他轉給北島，正式提出合作至1992年第三期結束。不久，北島於8月11日從巴黎來信對彼此的誤會表示遺憾。9月9日萬之又來信說找不到人接，希望我接着做下去。那時我自己正在轉換工作，我後來想到的辦法是讓《今天》跟牛津合作，略為減輕《今天》的財政壓力。這是後話了。

跟夏精文見面的情形，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我給萬之的信是這麼寫的：「和夏精文見面，詳細討論了《今天》和《今天叢書》的有關事情」。<sup>2</sup> 在這封信中我再一次羅列了具體印刷雜誌的資料，包括每期字數、印刷數量、封面內文用紙，並同意收到來稿後在一個月之內出版印行。現在看來有趣的是，協議上列明印出來的雜誌，每本重量不得超過 250 克，這是因為《今天》是一本百分之九十要通過郵寄才能送到讀者手中的刊物，郵資昂貴令我們苦不堪言。1990 年 10 月 24 日正式回覆萬之後，開始正式合作。過了一個星期的 10 月 31 日萬之來信：

用國際快件寄你全部稿件。因我們的延誤，致使雜誌略有拖期。如能在十一月底前印出就好……我想，你已為《今天》工作，故將你的名字列入了《今天》名單……發稿的版式都由你決定。雜誌請橫排，這是北島堅持的。

在香港出版的總 11 期，於 1990 年 11 月底按時面世。出版時我把雜誌定價由萬之建議的港幣 30 元改為 25 元。印數 3000 本，其中 1000 本委托香港田園書屋發行，1400 本，依萬之提供的名單，用國際快遞、航空、平郵、包裹等方式，寄發到全世界各地。要命的是，萬之留下 600 本雜誌由出版社暫時代為存放。香港是一個沒有剩餘價值、只講利潤的城市，寸地尺金，我們當時還住在父母家裏。哪有可能每期存放 600 本雜誌。但北島堅持既然印 3000 和 2500 差不多錢，當然多印一些。時至今日他的想法依然如此，看着他校辦公室和家裏都堆滿雜誌，我心裏美滋滋的，他倒沒有我的牢騷，最多只是說那有什麼辦法呢。

在香港印出第一期後，已立即發覺這不是我所能承擔得了的工作。<sup>3</sup> 我只有業餘那丁點時間，發排編校印刷郵寄，我上班在新界沙田中大大學，植字公司在港島灣仔，印刷廠在柴灣。這樣走一次差不多是香港最遠的路途了。出版週期所謂的一個月，其實編校只有不到一週的時間，因為植字總得花去三四天，詩人文學家字跡龍飛鳳舞，複印件傳真件模糊不清，作者本人的錯別字不說，經驗老到的植字員也

<sup>2</sup> 本文中提到的《今天》，有時候是包含着《今天》雜誌和《今天》文學叢書的。從復刊開始，北島他們的想法是，既出版季刊《今天》文學雜誌，同時不定期出版今天文學叢書，這當然是老《今天》的傳統。只是在開始的那些年，叢書一直都未能排上工作日程。雖然萬之在復刊第二期已在「編者語」中宣佈：「第一批正在編印的叢書包括《黑盒》（北島新作 38 首）、《多多詩歌散文集》、《今天小說選》」。萬之來信有時候也會跟我商量一下印叢書事宜，比如 1992 年 4 月萬之來信：「另一個問題是早就名聲在外的今天文學叢書。現在我手邊有現成的多多、楊煉和趙毅衡三本書。如果每種印兩千冊，你認為要有怎樣的預算，包括稿費。我真懷疑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萬之很快又告訴我，當時整個賬戶裏僅存四萬美元左右，怕連維持《今天》雜誌出版也成問題。結果叢書的事一直未能付之實行。直至到 1999 年——那已是和牛津合作的後話了。而這個合作，所有的製作費用全是由牛津承擔的。

<sup>3</sup> 現在，打字排版電腦化，非常簡便。從出版發展史上來講，由傳統式手民鉛字排版，到電腦打字排版之間，還有過「植字」這過渡期。九十年代初《今天》的排版在當時的香港，正處於這一過渡階段，比內地略為先進。收到稿件後，我會送到專業的植字公司（有意思的是為了保證賬目清白，我至今還保留着很多聯興植字排版公司的發票），百度百科說「植字是將鉛字一個一個地從木架上選出置入排版用的鐵盤，稱為揀字或植字」。這指的植字是更早的時期。《今天》經歷的已半電腦化，植出來的字，不需要從木架上選字，先用點陣機打印在摺紙上校對，為了節省成本，植字公司使用疏鬆的點陣列印，分段不分行，而是從一桌面大的鍵盤上選字，植入電腦中。校改過後，沖曬相片般沖印成「咪紙」（說白了，其實就是文字的相片，等於我們現在高質素的雷射打印）。為節省成本，分行分段但不分版。一篇文章一長卷。這種文字相片，按尺寸長度算價錢。好心的植字員，看到《今天》這種一行只有幾個字的現代詩，會好意地代為充分利用空間，把幾十頁的詩行拼排在幾頁裏以節省成本。一卷卷的文字相片沖曬出來後，手工切割，分頁貼版。拿去沖曬成一頁頁膠片，再送到印刷廠。這些工序在一家出版社裏，歸製作部管，很少有人是從編輯校對到植字印刷跑腿，都由一個人在工餘時間做的。

植得滿紙錯字，二三天能校一遍就不容易。《今天》編校之粗糙和錯漏，成了我的污點和內疚。接着花一週時間貼版製膠片，留兩週時間給印刷廠，其間看印刷藍樣和改正什麼的，只好自己跑到印刷廠就地解決問題。這種憂慮，劉小楓明白，因為我們的所謂出版社，只是一個空殼，他們在海外，我和淑娟都全職上班打工，沒有社址沒有倉庫本身更沒有資金，甚至每期雜誌所有的開銷都得先墊支，再由萬之歸賬。當時的工作條件和我自己的那點出版經驗，完全不足以在一個月之內出版和郵寄<sup>4</sup>這樣的一本雜誌。這第一期剛印出，小楓即要我重新考慮值不值得做下去。尤其當1991年小楓回來，看見剛印好未及寄出的總13期都成山堆在家裏，他對自己最初的提議悔不當初，當即要寫信給萬之。只是現在找不到任何有關的來往書信，找到只是1991年2月跟萬之關於總12期的發稿信。

## 二

《今天》復刊第三期開始，稿源開始後繼無力。萬之焦急，1991年2月5日，萬之來信解釋未能依時發稿：「先寄上詩歌、散文稿，評論拖後腿，李陀、李歐梵稿都未如期完工……曾千之的封面也拖遲了」。直到春節前兩天的13日才發出最後一批稿件。這樣的情況一直令人心急，1991年9月26日萬之又來信感嘆：「接到韓東從南京來信說《今天》對國內作者仍很重要，每千字二十美元的稿費不是可有可無的。」相信韓東不會想到，這句打氣話卻傷了萬之的心：「如果《今天》也就是以稿酬吸引人，其下場也是夠可憐的了……不過若是這樣能為國內朋友做些事，我還願努把力。」

當時編輯部名義上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主編北島人在巴黎，小說編輯是萬之和人在法國的張亮，詩歌編輯是北島、在德國求學的張棗和巴黎的宋琳，評論是美國的李陀負責。封面設計曾千之在挪威奧斯陸。問題是這些人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大多都只是短期羈旅逗留。1991年李陀來的信主要都是報告新地址：「我來到伯克利後一直找房子，又因要在伯克利大學教半年課，同時還得備課，故一陣忙亂。我的地址是……電話過兩天才裝上。」

稿源不足以外，就是編輯部人手的變動，幾乎每年都會接到北島類似這樣的通知：「最近編輯部做了調整，增設孟悅做評論編輯、張亮（南方）做小說編輯，李陀因年初回國，出於安全考慮，暫不在雜誌上掛名，以特約編輯身份（不公開）在國內組稿。張亮九月份借回國探親的機會組今年第四期的小說稿，我請他設法和國內的民間發行網取得聯繫，若成功將會擴大《今天》在國內的影響。具體結果，張亮會告訴你。」寫這信時，還是1992年，北島竟然寄望國內民間會發行《今天》雜

<sup>4</sup> 每期1400本五花八門的郵寄，於我來說至今仍在是一夢魘。我相信沒有哪一本中文文學雜誌像《今天》一樣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而因這個「世界各個角落」郵資差別很大，收件者又由1本到100本的，數量不等，各式各式。有的寄印刷品，有些因數量達一百本，必須分成四五個包裹郵政局才肯受理。我們沒有工場，2000本雜誌先運到家裏，在三五天內，拆包入袋重新打包、計算郵資、搬運到郵政局，沒有車，出租車也不能停靠在郵政局門口的。連家人朋友都發動起來，仍疲於奔命。一開始沒有經驗，不懂得要事先向郵局申請，才能印製使用塑料郵袋，貼上郵票後因為黏貼不牢，被郵政局召到國際郵件中心訓斥，蹲在地板上逐一郵件檢查補貼膠紙。這樣被監督着幹了大半天，在灰溜溜的回家途中，我記得很清楚，決定從今以後不再跟《今天》有任何瓜葛。



誌，對於北島這種樂觀主義精神，因而堅決不肯減少印量減低庫存，我和萬之常常哭笑不得。

當然《今天》最大的困難是發行。我相信，從挪威轉移到香港，北島他們一度對《今天》的發行抱着很大的幻想，總 11 期剛印好，萬之來信問能否把存在他那裏的 1000 本復刊號寄到香港來。但根據我保留下來的記錄，現實非常殘酷。1991 年年底的田園書屋發行結算表其實整個是一張「退書單」：

	來書	銷量	庫存	退書
總 10 期	200	69	0	131
總 11 期	1300	318	0	982
總 12 期	1000	116	0	884
總 13 期	360	174	0	186

事隔這麼多年，我相信《今天》同人不反對我在此公開二十年前在香港第一年這樣的一份「成績單」。敏感的讀者一下子會意識到，其一，發行商很快發現雜誌滯銷無利可圖，必然逐期減少進刊量；其二，年終退書時態度堅決一本也不肯庫存；第三，年終這兩千本的退書，對於沒有社址沒有倉庫的我來說，又一次陷入了愁困。我自己那時做出版雖剛踏進第五個年頭，但也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吃力而極為不討好的工作。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二十年來並沒有明顯的改善。雖然我們先後改換了七家不同的發行商。每期不斷累積的舊刊，一直跟我們爭奪家居空間，直至北島搬家來到香港。

### 三

北島一直在說，他要好好寫一篇「籌款記」。我曾略略算了一下，算上稿費編輯費，每期《今天》經費大概需要八千美元，後來的更不止，二十年九十期一共用了逾百萬美元。若加上幾次重要的活動經費，總共超過一百五十萬。所有的費用都是北島和《今天》同人籌募回來的。

平時聽北島回憶種種籌款經歷，談笑間灰飛煙滅化為烏有，非常戲劇性，只覺得好玩好笑。因為事過境遷，淡忘了箇中的尷尬、焦慮和失望。其實，我雖一直置身度外，不知來龍去脈。只是事關每期雜誌有沒有印刷費在手，要不要付印，萬之北島總會第一時間通報消息。1990 年萬之來信：「我和北島已輾轉來到芝加哥，籌款之事仍在進行之中，似有些眉目，大概不會空手而歸。」記得當時在聶華苓、戴靜、譚嘉、李歐梵等幫忙下，申請一筆五萬美元的美國洛克菲勒基會的資助，誰知這筆我們等着開鍋的米遲遲並未到手。1991 年 3 月，萬之來信：「Rockefeller 的錢尚未轉來，我們賬戶中錢不多了……下期開始，想減少印數。」9 月，錢還未到位，是年第三四期合刊被迫放緩腳步。到了 12 月 10 日萬之又來信：「寄上支票一張，是我暫時籌措的。不過愛荷華那面的錢肯定會到，你可以放心……現在稿件很多，幾乎看不過來。說明《今天》會有起色」。那一期結果以合刊號(14/15)形式印行。

總 14/15 號是一期評論專號，李陀主編，我一直認為是《今天》復刊後的一轉捩點。表面上只是改變了開本、我在香港請陸智昌設計封面。<sup>5</sup> 關鍵的是，編務從這期開始，從北歐轉移到美國，相對來說，美國的作者和人力更集中一些。我記得那一期到了 1991 年 11 月才收到目錄，為目錄中的陣容我精神為之一振：李陀、王德威、羅多弼、杜博妮、阿城、孟悅、張旭東、王瑾、王曉明、顧曉陽、奚密。其中有一小插曲，因萬之找回來的書信和我手頭的巧合，在此且又開去，多記一筆。

開始的時候，《今天》發稿全部由萬之統發。第二期時，萬之只寄來「發稿簽」，評論、小說、詩歌、散文，分別由各編輯直接往香港寄稿。後來連財務也這樣，根據記錄，從 1990-1992 年，前後收到的編印製作費，分別來自於挪威、丹麥、瑞典、愛荷華的不同銀行賬戶。

1991 年 10、11 月北島親自來信和發稿：「五六期（總 14/15）合刊的稿子已經發的差不多了……慶幸的是，印刷費已不成問題，最近我們又得到瑞士一家基金會的一筆捐款。附上一首詩歌，請編入本期。」北島顯然對馬蘭這首《革命》<sup>6</sup> 情有獨鍾，他隨即寫信給萬之：「我從小查轉來的詩稿中，選了一首《革命》，作者馬蘭。我們應給國內那些不知名的作者更多的信息，這首詩我已用 FAX 傳給林道群，請你加入目錄中，我也同時得到了張棗的同意。」不幾天又收到北島自己為這一期寫的《編者的話》，這篇《編者的話》含金量豐富，在此且多引幾句：

本期為 1991 年三四期合刊。從本期起，《今天》的面目有所改變：縮小開本，陸續增設一些新的欄目，打破國內文學期刊分類的傳統格局。在對復刊一年多來的刊物做反省後，我們適當地調整了編輯的方針……由於舞台的轉換，許多中國作家已經處於國際文學的渦流之中。多種文化的撞擊與交錯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學的興起正在改變國際文學的格局。我們應從某種封閉的流亡心態中解脫出來，對國際上文學的重大變化作出回應，並關注港台等地區華語文學的發展……今天文學基金會於今年七月在美國成立。它不僅成為《今天》雜誌的後盾，而且正着手組織一系列文學活動。

文末是北島詩的語言：「權力依賴的是昨天，文學面對的永遠是今天；因此，文學用不着和權力比壽命。它的責任之一是從今天俯視昨天，並從中塗掉權力的印記。」

我擅自把「權力依賴的是昨天，文學面對的永遠是今天」印在封面上作為宣傳，誰知卻有人不以為然，有《今天》的作者老友收到雜誌從美國來信：「很喜歡新版式，像樣多了。未翻開看到北島印在封面上的話，覺略過火，也許未必，自己過敏……**次**吃驚於批評理論文章如此之少。不管怎樣，作為一個合刊號而不是李陀吹噓的批評專號，還是滿像樣的——指形式而言。就內容而言，小說部分慘不忍睹，如此下

<sup>5</sup> 《今天》復刊後封面，由至今人仍在挪威的曾千之設計，一直沒有機會見面，最近偶爾在微博遇上。曾千之的封面設計，特別是封底採用多多、北島、楊煉、張棗詩作手書，現在看來，頗得讀者喜愛，但當時他的設計頗受到北島等編委的壓力。希望曾兄不介意我在此引用萬之的來信：「曾千之的封面，普遍地對他設計反應不好，但為了頭一年四期統一風格，我和北島仍請他設計第四期。以後想請你在香港物色一人，也可省去設計稿來回郵寄的麻煩。設計不用繁瑣，簡單些就行。」此後一直到 1996 年，封面設計由陸智昌和我自己來設計。再後來由美國的李曉軍擔當大旗。

<sup>6</sup> 馬蘭《革命》：「革命的意義/產生在特別的領域/那時候，頭痛/而且眼前模糊一片//對手把自己掩藏起來/但是/他身上的條紋，那件衣服/使我憤怒不已//他是很強健的/我是很堅強的//我的血還沒有開始流/可已經有人在譴責我了」。

去，《今天》似應停辦小說欄；詩歌部分仍是一派遺老遺少，脫不了十年前的框框。」對《今天》這樣的批評，就我聽到的還不算最苛刻的，另幾個老朋友如甘陽、小楓、旭東知道我只是「承包」，說話從來不拐彎抹角。

愛荷華—芝加哥聚會，對《今天》復刊來說是一次遵義會議，方針和策略都得以重新調整。一是《今天》同人在各處難得有機會見一次面，其二是在芝加哥因為李歐梵組織的研討班，相聚的時間長，各方的朋友來得很多。我並沒有參與愛荷華聚會，都是聽說的，1991年編輯碰頭會<sup>7</sup>，1993年那個後來成為文學評論界一個「傳說」的《我們怎樣想像歷史》討論會。<sup>8</sup>我來到芝加哥的時候已到尾聲，很多與會者如香港的也斯、陳清僑、台灣的南方朔雖都回去<sup>9</sup>，但國內來的王曉明、朱偉、吳彬等等都還在，加上旅居芝加哥的李歐梵、劉再復、甘陽、黃子平、查建英，我記得大家都在討論「民間社會」。後來一直忘了問陀爺、北島和萬之，芝加哥研討班有關民間社會的討論，怎一個字也未出現在《今天》上呢。反而，我離開芝大時帶走甘陽的一篇《民間社會概念批判》長文回香港，文中把與會者的討論徹底地清理了一遍。

說起來芝加哥之行是我第一次見到《今天》同人。1991年3月萬之來信說夏天他們在芝加哥聚會，津貼半張機票，要我也參加。北島、萬之那時候還不完全知道，我們註冊的所謂「社會理論出版社」，雛型跟芝加哥同人有關。1990年甘陽、劉再復等通過當時芝加哥大學東亞系的李歐梵教授，向盧斯基金會遞交申請，申請項目包括在香港成立一家學術出版社。而更早的1988年，我因編輯《鐵屋中的吶喊》，跟李歐梵先生早有聯繫，1989年更一度攜手在香港協力幫助過流亡學者。加上當時人在香港中大的王曉明也參加芝加哥聚會，1991年7月中我和淑娟遂也到芝加哥甘家裏呆了半個夏天。記得當時所帶的行李是幾十本總12期《今天》，到埗那天北島請吃墨西哥飯，萬之來接我們，捧抱的幾十本《今天》在馬路上脫手散了一地。

當時香港的《二十一世紀》也剛創刊，專職編制有七位人員，本來是完全不相同的刊物，聊天時大家總免不了會問一些比較性的問題，一相比較《今天》顯得更為艱難。我記得北島當時的神情並不服氣。

《今天》的艱難於我來說有一件小事令人難忘。1992年我從《二十一世紀》轉到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工作。此前我跟《今天》的聯繫多用學校的自費傳真機，因轉換公司，我要求《今天》花三千港幣買一台傳真機。此事雖最後落實但過程無趣之

<sup>7</sup> 住在愛荷華的譚嘉女士自此擔任《今天》的財務，隨後1993年起更接任萬之擔任《今天》社長近十年。

<sup>8</sup> 李陀、黃子平以《今天》名義1993年5月1日在愛荷華組織了《我們怎樣想像歷史》討論會，與會者包括李陀、黃子平、孟悅、劉禾、鄒羽、張旭東、唐小兵。黃子平曾把這次討論導言部分，整理發表在《今天》，並作為附錄收在唐小兵編《再解讀》一書中，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陀更希望牛津能出版整個討論記錄。1993年5月李陀來信說：「你同意為愛荷華會出本書我真高興極了！將此消息告訴幾位同仁也都十分興奮。我以為此書將會有不一般的意義。」10月陀爺再來信：「愛荷華會議一書，諸人都同意寫文章，且態度都非常積極，只是我還在同大家商量諸文如何形成一個共同的傾向(主題)。子平已給我來信，你應催他盡快把全文整理出來，這會是一本好書。」陀爺再在「好書」加上着重號。時至二十年後，另一與會張旭東在一本《我們時代的寫作》中還舊事重提：「《再解讀》裏邊有個談話記錄，記錄了這場討論，是《今天》雜誌在愛荷華城聶華荅家辦的。大家態度都是認真的，是在談當代文學和當代批評之間的關係。」

<sup>9</sup> 在此特別提到今年(2013)剛去世的也斯(梁秉鈞)，是因為也斯跟《今天》關係淵源流長，1991年芝加哥一聚，李陀更委托他為《今天》策劃一期「香港文化專號」——也就是後來1995年出版的總28期。這期是所有《今天》期數裏印數最大的，先後加印了四次。只是連北島也不知道的，這期專號剛出版後，我代《今天》把稿費付給也斯和各香港作者，《今天》的稿酬只是當時香港普通標準的一半。

極。而在家裏安裝上這台屬於《今天》的公家傳真機後，因時差關係經常深更半夜接收歐美發稿，對家人的騷擾在此更不足為外人道。

#### 四

買傳真機只是小插曲，後來我才漸漸從萬之那裏知道，自從《今天》成立顧問委員會和基金會後<sup>10</sup>，問責和財務管理要求嚴格。遂有 1992 年萬之和孟寧執筆全面整理的《今天》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到了 1992 年秋天我已決定辭退，因為實在力有不逮。然而一直拖到年底，《今天》仍未找到接班人。我遂建議《今天》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所有印製費、郵資，實報實銷，牛津負責所有人力行政支出，其中 500 本《今天》牛津可自行發行收益(其實平均每期發行並不超過 200 本)。

譚嘉(後來我才知道她也是香港人)打理《今天》財務的認真和嚴格，和牛津合作無間，我不再理會財務和郵寄刊物事宜，在一家有規模的出版社裏編刊，畢竟跟以前大不一樣。最主要的還是，從 1993 年開始，主要的編輯校對工作放在美國，由紐約的王渝大姐和加州的王瑞芸負責。雖然當時電腦開始普及，但彼此所使用的電腦不一樣，常常因為文字檔案未能互相兼容叫苦連天，甚至導致嚴重的錯漏。但那畢竟是科技時代和手工作業時代的差別，與復刊初期的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語。

1993 年是《今天》轉折年，但那年秋天顧城謝燁的慘劇，對《今天》來說是一大震驚。我並未見過顧城謝燁，《今天》復刊後好像也未發表過顧城的新作，但顧城出事，很多人看着《今天》。10 月 12 日王渝傳真：「顧城之事感覺不好，很難受。為謝燁、謝的男友、親友還有他們的幼兒。我和張棗、李陀、北島、萬之都討論了，正在收集他們的遺稿，就刊出他們的遺稿作為追思。」過幾天 10 月 16 日王渝又傳真：「顧城之事，先是不知如何感覺，後來感覺很不好，很不好。我們還沒找到謝燁的稿子。我希望能找到。」後來找到了，這就是後來《今天》1993 年冬季號(總 23 期)刊出的謝燁《你是小木耳》、顧城《鬼進城》(組詩)和張穗子的《顧城訪談錄》。<sup>11</sup> 當時遠在倫敦的趙毅衡也來傳真「謝顧慘劇，令人震驚，日夜不安」，趙毅衡和在英國一群關心中國現代文學的朋友想 10 月 23 日辦一展覽，展出謝顧兩人的照片、手稿和畫作，希望《今天》給他們一些複印件。

自從在美國成立基金會後，《今天》的財務情況有所改善。1993 年北島來信說，我們最近籌到一點錢，印刷費危機過去，有點餘錢，能否送點小禮物給讀者，恰逢《今天》十五週年了(1978-1993)，這一期加印一張日曆卡好嗎？我說好呀。周氏兄

<sup>10</sup> 根據譚嘉當時印在《今天》信紙上的資料，顧問委員包括：Margaret Atwood, Allen Ginsberg, Maxine Hong Kingston, Liu Zaifu, Czeslaw Milosz, Pai Hsien-yung, Octavio Paz, Susan Sontag, Jonathan Spence, Tomas Transtromer, Tu Wei-ming, Kurt vonnegut。編委成員：聶華苓、北島、陳邁平、多多、黃子平、李歐梵、李陀、譚嘉、戴靜、查建英、鍾阿城。這個名單跟復刊時已頗為不同，沒有了高行健、郭順、顧城、顧曉陽、黃銳、孔捷生、劉小楓、劉索拉、裘小龍、徐星、楊煉、張棗、趙南和趙毅衡等 14 人，新增的則有聶華苓、李歐梵、譚嘉、戴靜等四位。可說是大換班。

<sup>11</sup> 就我的所知，顧城雖一開始是復刊號的編委，但不太參與編務。1991 年 9 月 2 日他曾給北島寫過一信(刊總 18 期，改為《致編輯的信》)，令人非常難以忘記。信是這樣結束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為什麼在一起(顧城自己加重符號)。在沒有自由的時候，我們獲得了精神。沒有精神的年代，起碼我們保存了真誠，真的，因為已經有人在遠遠地說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卑鄙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弟畫作，陸智昌為《今天》設計了一張別致的 1994 年日曆卡。直至 2008 年《今天》紀念活動，我印象中這是《今天》唯一一次送「禮物」。

1994 年 4 月 5 日紐約的王渝大姐寄來機票，忘了從哪裏籌募到的經費，這是一次編輯部擴大會議。後來都叫做第三次編輯會議。我是 4 月 9 日晚上才到肯尼迪機場的，王渝怕我人生路不熟，一再傳真教路令我感動。這一回又是第一次見到很多新的《今天》成員，除了萬之北島，新任社長譚嘉原來是香港人，在紐約開會期間我們常常私下用香港話笑罵其他與會者。和王渝第一次見面一見如故，她跟我香港很多朋友作家如古蒼梧是七十年代保釣運動的戰友。我還抽空拜會牛津的作者嚴家其和胡平。有趣的是我手頭還留着一紙會議議程：

1994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在北島房間。

上午：孟悅主持會議，倫敦大學的趙毅衡報告《今天》英文選集的進度。

張亮作文藝上「西方中心」論與民族主義心態的探討。

下午：王渝主持，漫談編務，包括如何申請基金如何推廣如何發掘新稿源。

來自倫敦的胡冬在我這張會議議程背面留下了他住在 Earldom Road 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會上滔滔不絕發言的歐陽江河（《今天》現任社長）。晚上在 236E. 47<sup>th</sup> Street, Apt. 27F 附近第二大道，有精美點心和美酒宴會，尤其讓我感到溫暖的是，這位家在曼哈頓酒會招待我們的主人，是在聯合國總部工作的一位香港人廖女士。最近虹影還在微博上跟我說起這一次見面好玩的事。關於這一次的編輯會，我還寫過以下的文字，紀念逝世的《今天》重要成員張棗。

詩人張棗三月八日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病逝時才四十八歲，北島寫了一則悲情往事，用電子郵件傳給我們跟張棗一起編過雜誌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們幾個人跟張棗一起，編過十年的《今天》。說是「一起」，其實有些言過其實。張棗一個人在德國念博士的時候，和他一起編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宋琳寄居巴黎，其後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諾斯艾里斯。主編北島居無定所，十年間住過十個國家。評論編輯李陀和劉禾雖一直在美國，但從芝加哥到柏克萊到密西根到紐約，地址變了又變。很多時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樣刊的地址已不一樣。只有小說編輯陳邁平的不變，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的郵址，那是在北歐，差不多有北極那麼遙遠。

這樣的一些人「一起」編雜誌，以前沒有電子郵件，又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得起傳真機，靠的只能是寫信。信件稿件從世界各個角落寄到編輯手上，再從四面八方的編輯分寄到香港，印成雜誌，再分寄回內地和世界各地。如此這樣，1990 年復刊後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稱為流亡雜誌。這個「流亡」，不是詞語，是生活。相對很多已經停刊的流亡雜誌，很多人都說，《今天》這樣活下來是一個奇蹟。事實上，現在不管我怎麼回過頭去想，也覺得當時那樣的操作模式，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那樣的編輯操作模式，是 1994 年在紐約，似乎是唯一一次編輯碰頭會議上決定的。忘記了是什麼人贊助的機票，在紐約開編輯會，但我記憶清晰，最後一夜在高樓天台看曼哈頓夜景，對着璀璨的燈海，張棗忽然向下縱身一躍，他說真

有跳下去的衝動。我當時覺得他舉止猖狂，有些造作。他那種過於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種壓抑的政治氣候、和別的流亡者那種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當然後來的十年我們寫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寫信的日子，讀已不復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詩歌，整個九十年代主要是張棗在編，他編的這十年詩歌，後來精選成一部《空白練習曲》詩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那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張棗寄來詩稿之餘，有時候也會為大家打打氣，他引豪夫里斯塔，這是「詞語拋下我們不管」的時代。接着張棗總會說，真正的詩人必須活下去。舉步維艱，荷戟獨往，就算是一個結結巴巴的追問者。他喜歡、或者說妒忌北島，他愛引用北島的話，比如他也說詩人是「黑暗中的演講者」。

認識張棗之前，讀過他的《鏡中》。今天重讀，仍覺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來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 面頰溫暖 / 羞慚。低下頭，回答着皇帝 /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據說是大學時期寫的，據說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出類拔萃。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

讀着北島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雜亂無章的電子郵件，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瑣碎，比如說張棗為了說服我出版柏樺的《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破費給我打了好幾個越洋電話；比如說張棗讓我記着當年編刊的艱難，那時每期收到張棗寄來的詩稿，所有的詩稿都被剪裁修葺過，繞着詩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紙張，只保留寫有詩行的小紙塊。不是嗜好手工藝，張棗要減輕郵件重量，省下郵資。

## 五

如此這樣，《今天》和牛津合作了四個年頭(1993-1996)，雖說是牛津和《今天》的合作，其實除了財務、郵寄和存貨不用我操心，其餘的仍是我獨自在編印，所以當1997年我有意移民海外時，牛津也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幸好譚嘉找到了台北的聯經出版社。為了交接工作，譚嘉回到香港，那是1997前，我們兩個《今天》香港人的寒暄家常，她代北島送了我一支名貴的Waterman原子筆，我一直沒用過，權且留着作為紀念。1997年《今天》轉移到台北後，生生不息。而我和家人雖最後放棄了移民，但九七前後香港的故事太熱鬧，竟漸漸的和《今天》相生相忘了。直到有那麼一天，北島來信說台北出版愈來愈困難，問我能否再接着幹下去時，我笑着說，《今天》離開香港這幾年，你們連雜誌都沒給我贈閱過一期啊。我雖開的是玩笑，但事實上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參與的那些年，《今天》的確沒能力顧得上每一個作者和讀者朋友，有的更多只是作者和讀者的默默支持。

我回覆北島和譚嘉說好吧。這大概可理解為一種復婚吧，只是事過境遷，牛津的出版方向早已調整，不再出版文學期刊。我遂建議以「今天文學雜誌」名義在香

港印行，法律名義上保留美國註冊，也照樣沿用美國的通訊地址。<sup>12</sup> 每期雜誌文章稿件均由美國的王瑞芸統籌，完成錄字校對後寄一張磁碟到香港，一如既往，我工作之餘擠時間在香港編排，跑印刷廠印行出刊，再從香港郵寄發行往內地和世界各地。好在經過十年操練，加上王瑞芸負責編校工作，我自己的電腦文字排版技術，從 PageMaker 4.5 到 7.0 持續跳了六個階梯，再進入 InDesign 世代，早已能獨立操作，不用再如十年前般跑植字公司，假以他人之手。發行方面，在本地仍找回田園書屋<sup>13</sup>，經過那麼多年，我已不敢再抱有幻想，田園代理只維持最低的發行數量（雖然在港台這樣的商業社會，低處總還有更低，每期仍存貨不少），我要感激的是，找到了劉氏友人願意負責所有的刊物郵寄工作，感謝老友魏承思代為存放過期刊物。

1999 年 10 月 11 日譚嘉以社長名義，代表《今天》跟牛津大學出版社簽署合約，出版「今天文學叢書」五種。牛津「今天文學叢書」計劃中的五種選題分別為：劉禾編《持燈的使者》、柏樺《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棗、宋琳編《空白練習曲：今天十年詩選》、萬之編《廢墟上：今天小選 1978-80》、李陀編《另一種聲音：今天小說選 1990-99》。後兩種出版時改換為李陀編《昨天的故事》和歐陽江河編《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復刊十年後的 2000 年，「今天文學叢書」面世。

## 六

2007 年北島全家移居香港，這象徵着《今天》真正落戶香港。為歡迎他們全家，我把家裏保存的一套《今天》送到他家裏，我的意思當然是把所有寄居我家的《今天》歸還給它的主人。沒想到北島稍為安頓下來後，不但無意改變我編印的工作，還開始了策劃新的計劃。《今天》在香港正式註冊為合法團體「今天文學社」，從此以後《今天》正式以「今天文學社」名義出版。以香港為基地，《今天》重新調整各編委的工作，歐陽江河加盟出任社長，他很多新的思路顯然堅定了北島的信念：「多種文化的撞擊與交錯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學的興起正在改變國際文學的格局。我們應從某種封閉的流亡心態中解脫出來，對國際上文學的重大變化作出回應」。《今天》在香港組織起文學沙龍，北島、李陀、歐陽江河、劉禾、翟永明、西川等志同道合，一個文學流派似乎再次塑型起來。

《今天》跟香港愈來愈密切，除了前述 1995 年委託也斯策劃的「香港文化專輯」，北島再次委託葉輝策劃「香港十年」（總 77 期）和黃愛玲策劃「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號」（總 99 期），當然其間還有北島自己策劃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專輯（總 87 期）。

<sup>12</sup> 編輯部地址是王瑞芸在加州登記的 P.O.Box 2049, Thousand Oaks, 發行代理地址則是譚嘉 P.O.Box 3384, Iowa City。

<sup>13</sup> 雖然這樣，發行仍然是《今天》的最大困局。後來跟萬之交談，我們對復刊初期國際各大學東亞系圖書的微訂反應記憶猶新（不計個人就超過三百個訂戶），可惜因為多年編輯部發行部輾轉變動，青黃不接。書店發行方面，自從北島來香港後，我們為求突破，先是由田園書屋換到同德書報社，再換到香港最大的發行公司聯合物流，後來又換到目前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台灣方面，我們也先後委託唐山出版社、聯經出版社、印刻出版代理過發行業務。

2008年《今天》三十年，承蒙香港利希慎基金、友好詹德隆先生的支持，《今天》在香港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今天》複刻重印了總第1-9期的老《今天》雜誌，並出版徐曉主編的《今天三十年》一書以誌自1978-2008年的大事，全書二百頁篇幅，復刊後的二十九年只佔其中的十分之一。後來者如何艱難，豈能與開創者相比。然而相信只有親自經歷了整整100期的北島體會到，像《今天》這樣的文學，對手不是專制，與商業社會的庸俗作戰，同樣荷戟彷徨：

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像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我們把這幾句話印成海報，讓與會的新老《今天》同仁<sup>14</sup>簽名見證，我們奢望說不定資本家也有附庸風雅的時候，會花巨資收藏這樣的海報，以補助《今天》的印刷經費。願望再一次落空，《今天》的道路畢竟是寂寞的。《今天》同仁相信也會寂寞地走到下一個一百期。

## 七

南宋詞人陳簡齋《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有句「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多是豪英……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在此借以為題，聊記為《今天》服務二十年之感懷。

---

<sup>14</sup> 包括了：芒克、北島、舒婷、嚴力、翟永明、韓東、歐陽江河、西川、柏樺、宋琳、朱朱、孟浪、廖偉棠、朱金石、陸煥興、徐曉、鄂復明、程玉、李鴻桂、程奇逢、王渝、是永駿、王瑞芸、胡仄佳、李彥華、葉輝、王苗、朱濤、林歆菊、肖海生、陳仲義、任傲霜、劉蓉蓉、潘無依、徐文、甘琦、林道群。



## 递送

陈东东

1980年底的某个上午，我逃课，赖床，窝在被筒里读易卜生。大学寝室关上的房门跟闭合的蚊帐这两道关卡，把安静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挡在了外面。我似乎打了个回笼瞌睡，睁开眼，发现有一只手伸进蚊帐，手上是一本油印的《今天》杂志。我拿过杂志翻看，一直翻看下去，错过了起床去食堂午饭的时间。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学校有人查问我从哪里读到的《今天》杂志，我能说的，就只有伸进蚊帐的那只手……也许，我真的不清楚是谁把《今天》杂志递给了我。

递送却留下很深的印象。递过来的那一刻，我总能获得一种郑重其事的愉悦，尽管有时候那个动作漫不经心。以后，又有许多地下杂志递送过来，我也无数次将地下杂志递送出去。它们开始于伸进蚊帐的那只手。2010年，徐晓寄给我复制的全套油印《今天》杂志，那晚我又窝在被筒里翻看了大半夜。我想要找出我当年读到的是哪一期，然而已经不能够确定。

1990年的复刊第一期《今天》是由哪只手递送到我这儿的，我也已经不能够确定。反正，那不会是邮递员交给我的。

“六四”以后，上海的气氛也分外过敏，再加上这年3月，廖亦武、万夏、李亚伟等七诗人在四川被捕，消息传来，我这里，一时也真有点儿“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了。我怕抄家，就趁月黑风高，鬼鬼祟祟把几大摞地下杂志搬到了我父亲的办公室。那间很少有人会去的办公室，在离我家不远的上海音乐学院。

很快，涪陵公安局和四川公安厅的两个警察由一位举止文雅的高个子上海小伙陪同，走进了我靠近外滩的办公室。说上海的这位便衣举止文雅，是因为那两位蜀地警察拍桌子挽裤管（时值暑夏，无袖可挽）太过粗野。他们为一盒录有廖亦武朗诵其诗作《大屠杀》的磁带而来，盘问，笔录，然后气呼呼大踏步离开。再然后，我就不定期地有茶喝了，被盘问的也不再限于磁带，而是“草木皆兵”。我收到的信件，则越来越多破损而盖有“收到时已如此”的黑图章。

很长一段时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杂志是违禁品，不可能通过邮局寄进上了黑名单的我那个地址。我能够读到和收藏1990年以后三、四年的《今天》杂志，全靠朋友们递送。其中有些是受托转交，受托者可能是对文学没什么兴趣的留学国外回来过假期的理科生，可能是去国外演出归来的小提琴家，可能是对功夫痴迷不已跑来找师傅的外国人，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贪玩的小美女……而那个委托者，便是张枣。他在德国；他任复刊后《今天》杂志的诗歌编辑直到去世。

我能够大概收齐那些复刊后的《今天》杂志，首先靠的就是这种递送。几年以后，某位请我喝茶的便衣说，《今天》被定性为偏右杂志而不再是反动杂志了。然而，我想，我能收到邮局寄来的《今天》，多半因为《今天》编辑部打印错了我的地址。差不多有十几年，每年四次，我都是从我的邻居那儿拿到这份杂志的。

宋琳是在摆脱了上海警方对他的监控限制，去法国以后担任了《今天》的诗歌编辑。笔名南方的小说家和诗人张亮，也是在1990年代初从上海去法国的，他担任

《今天》的小说编辑，也有十五六年吧。他们两位，还有张枣，不时来信来电话要我帮着组稿。我邀约收集到的交给《今天》编辑们的稿子，当然也不敢邮寄，怕被拦截，“弄丢”，于是多半也是靠递送。

1990年代，我在上海的乐趣和烦恼，常常正是从海外回来看看然后离去的朋友们。他们回来，带来一些小餐馆里的饭局，路边排档的夜宵；他们离去，我多半就会有一两次被请去喝茶。张枣、宋琳和张亮，都是来而再来，又来，反复来上海的朋友。这三个人，要么是上海的女婿，要么曾在上海读书和工作多年，要么是上海人。他们来的一件例行公事，就是把给《今天》的稿子带出去。我笑称他们像是来收租的，每次，他们都能从我这儿收到不少租子。

递送稿子给《今天》的编辑，自有一种反特电影般的紧张，但这种紧张，有一多半，如果不是庸人自扰，那也该叫作诗人自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并没有约定过，但是将稿子交给这三位，每次却都会很有默契地找一些特别的场合。

最紧张的是张亮，他的表情和说上海话的腔调里总是有一种就要出事情了的暗示。有一次他约我在静安宾馆对马路的红宝石见面，我过去时，他站在店门口，很焦急的样子，我把装稿子的大信封给他，他迅速收下，跟我草草聊了几句（谈的是上海城市规划的糟糕和上海名牌店里蹩脚的皮鞋），然后，我们像两个专业接头的地下交通员那样经典地背过身去，各奔东西。另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到音乐学院门口，并没有下车，收下信封即消失在夜色里，好像要马上直接骑出国境线给《今天》送稿子。

张枣会对稿子提要求。譬如他会在电话里说，听说哪个小镇上有个税务员，诗写得太好了，能不能找他要点稿子来？他也会说，可不可以缩小了复印呢？这样好带一些。要是我没有记错，甚至曾经在弄堂里一个公共厕所边上，我把一叠稿子给了他。那也许是随意，也许还是有点儿紧张。走过的时候，他说：“上海的这种厕所都一样，一股皮蛋味儿。”

宋琳则总是会迟到，然而再怎么迟，他也会到。他的时间紧张，面面俱到，每个人都见。这让曾经请他喝过茶的某便衣有些受伤，在某个宋琳离开后照例请我喝茶的时候，便衣说：“带话给宋琳，下次再来上海，我要找他一起坐坐。”不过宋琳根本安排不过来，有一年的2月底他在上海，拿着一个小本子对我说：“东东，我发现我少了三天时间，2月28号以后直接就3月1号了。我安排在2月29、30、31号的事情，都只好压缩。所以，现在赶快把稿子给我……”

## 我认同的《今天》

韩东

1

1989年6月初，穿风衣的查建英从北京过来（这只是一个印象，实际上不太可能，夏天已至哪有穿风衣的），在南京大学某食堂的前面摆着一张课桌。查讲了些什么已经忘记，只记得她带来一盘磁带。录音来自天安门，有人声、口号声，可能还有枪声，但你只要明白那是来自广场的声音就行了。查建英则来自北京。她是见证人，并提供了证物。聆听的人一概站着，有的手握旗杆或横幅的撑竿，现场旌旗垂落，气氛空洞压抑。之后一支队伍便出发了，出了南京大学的后门，走向鼓楼广场。沿途围观者多于行走的人。六七十号人的规模也不算小，但还是显得可怜巴巴的，悲悲戚戚，就像一支送葬的队伍。越走，人越稀，到达鼓楼时方觉得广场之广，擎旗者将几面旗子插好竖直就算完事，一帮人便作鸟兽散了。这可能是南京的最后一次游行，或者最后一支游行队伍。我跟着走了一个来回，觉得已无事可干，空虚可能还有恐惧袭来，心里想，还是回去写小说吧。

几天之前，气氛却迥然不同。所有的人都往鼓楼广场涌，远离广场的住宅楼里也人声鼎沸。世上好像多出了十倍的人，所有的人都放开了嗓门，议论着同一件事。我嫂子癌症晚期，和我们有一帘之隔，她的床头响彻着收音机的声音。只有哥哥一人能进入帘后，给嫂子换药，同时传达广场上的消息（北京和南京的广场，全中国的广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一个结果，我们家则在等两个结果，革命的胜利或者失败以及我嫂子不可避免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如果革命的结果发生在死亡之后，对嫂子而言那就太遗憾了。看得出来，她强撑着不去就是为了这事。嫂子的生命终于熬到了革命破灭以后，从春夏之交到了真正的炎夏，但也不可能更长了。

最后一次游行之后，哥哥曾对我说，他如果不是要照顾我嫂子就去广场静坐了。那时，鼓楼广场上已无人集会，这么说大概是想躲开我嫂子的死吧？愤懑的他质问我，为什么不去广场？我该如何回答？说广场上已经没有人，查建英的磁带仍在我的脑袋里播放，我被枪声吓破了胆？还是说我想回来写小说了？

这些事看似和《今天》无关，然而命运的线索总是埋藏在不相干的某处的。撇开《今天》的大历史不论，在我个人的小历史中，查建英恰好是我后来的责编之一，是她和万之将我的小说编进了复刊后的《今天》。其中有一个中篇《杨惠燕》就是写我嫂子的，是以她的生死苦难为素材的。这篇小说因我哥哥的要求没有在大陆发表，惟一的去处就是《今天》。人生不免深奥莫测，有人演绎故事，有人写故事，有人负责出版。在时空的某一个点上，三者聚首却不相知，因为那故事还没有演完，更没有写出（连动机都没有），适合发表刊载的平台也没有搭建。但一切已在必然的运作之中，好个虚席以待！顺便说一句，《杨惠燕》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为用心并超越了满意和不满意的小说。

1990年底,《今天》在瑞典复刊,和一年多之前刚过去的革命应该不无关系。也许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复刊号上刊载了高行健的政治剧《逃亡》,隐射之意昭然若揭。对此办刊方针的调整我感到失望,空虚之感不免再次袭来。这是很难解释的,难道这不是抗议的继续吗?但在我的理解中却是又一次死亡,继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之死。

我是老《今天》的读者,这本刊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几乎就是文学独立的旗帜。就我个人浅见,文学的独立是本体要求,无任何条件可言,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它的表达是颠覆性的。文学是超越,是另一维,如此才可能有新质的产生。它既不应为政治服务,也不因为抗议强权而具有根本意义。《今天》自打办刊之日起,便承受了来自政权的高压,但它并没有因此滑向另一端,以政治抗议为己任。老《今天》的抗争发生在外围(刊物的生死存亡),而内容始终是文学为大的,坚持标准、酝酿美学创新。《今天》不是普通的作品发表平台、园地,也是一座堡垒,对文学异端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或保存。将抗争的品质直接移植到作品中并形成倾向的确是一曲挽歌,需要哀悼之事。《今天》之后再无《今天》,或者说,我宁愿再无《今天》也不要政治异见但美学平庸的《今天》。

好在复刊后的《今天》对抗者的姿态没有进一步延续,当初办刊方针的波动可理解成突发事件造成的良心压力作祟。特别是大部分编者身处海外,对同胞命运的关怀让他们不免有点急功近利。几期之后,《今天》才接受了像我这样的作者,我也才对新《今天》产生了久违的认同感。

我从老《今天》的读者变成了新《今天》的作者,《今天》对我的帮助说到底是很实际的。不仅在国内无法刊发的作品可以在《今天》上发了,所得稿酬也远远高于国内的期刊。当时国内的稿费标准大约在千字40元左右,《今天》开出的却是千字20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兑换就是160元人民币,高出国内整4倍。这些钱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身在体制之外,凭我写的那些东西也无望赢得市场,而且当时我已在酝酿辞职。由于时空关系,稿酬常常无法按时寄达,记得我曾多次写信询问。及至收到支票,按当时规定,所得外币得在中国银行里存上三个月。于是我又去找前女友开后门(她恰好在中国银行上班),让她帮忙及时取出这笔钱。

1993年,一切准备就绪,我用积攒的《今天》稿费买了一台电脑(共计9000人民币)就彻底离开了原单位,专事写作。除此之外,面对如此人生转折便再无准备了。我可以吃住在母亲那里,但一支笔无论如何是需要的。电脑就是我的笔,我将它当成打字机使用,自己则变成了写作机器。

辞职的第一年,我所得的国内稿酬是90元人民币,来自我和朱文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对话,一共是180元,对半分我得90。提及这些只是说明写作为生的不易,《今天》对我的帮助是具体而及时的。

这以后,我把朱文、李冯、吴晨骏等几个年轻作者介绍给万之、查建英,他们的作品也陆续在《今天》上刊发。没问过朱文等人的感受,但可以想见,刺激或激励一定不小。首次发表作品,而且是在《今天》这样一本特别的杂志上。相对很高的稿酬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某种认同。《今天》独立于国内的所有期刊,有其神话

般的自由传统，历史虽然不长，但却是惟一的。《今天》始终是一本地下刊物，无论是老《今天》还是新《今天》都属于“非法出版物”。如此气息及其秘密传播在立志文学的年轻人中，魅力自然不容置疑。

面对《今天》的这种特殊存在，国内作者的态度截然有别。一是一些功成名就者，屡被约稿但心存疑虑，生怕被境外势力沾上。他们有意识地回避而不及。另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作者的心向往之。身处国外的编者可能不清楚，但我们却看得甚为分明。因此有一度，我对《今天》偏向国内热门作家的做法不禁疑惑。人家躲得远远的，你这又是何苦？但后来也释然了。稿源缺乏、信息交流不畅，加上新《今天》较之老《今天》更加包容，格局更大，不以作者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为取舍。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最终，《今天》没有成为政治异见者的策源地、反对派的文艺工具，我觉得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为过。

### 3

2007年，我加盟《今天》担任小说编辑。对个人来说，此事具有纪念意义，我完成了从《今天》的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者的成长之路。自然很高兴，也深感荣幸，第一时间就将这事写进了我的写作年表。我有某种“根正苗红”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抵达的兴奋。

至于具体的编稿工作我则遵循自己的理念，倾向于年轻作者、不出名但具有实力的作家。名家的稿子难约，对他们而言在《今天》上刊载也缺乏意义。对《今天》来说就更是这样，作者队伍如果和国内期刊大同小异，小说一栏就可以取消了。由我编发的曹寇、阿乙、乌青、谈波等现在都已成了国内年轻小说家的中坚。此外我还编发了一大批诗人的小说。一来我和诗人熟悉，二来，诗人写小说用心单纯，功利性较弱，在写着无用之诗的同时写着无用的小说。最后，自然是语言优势，经过诗歌训练的小说作者语言过硬。我以为，汉语文学的创造力就是在这些细节处涌现的，而非在执意或故意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这涉及到我对文学价值的理解，也涉及对《今天》这本特殊刊物的理解。无论我的做法是否恰当，都是忠于自己想法的，也忠于对《今天》独立品质的信念。

2008年底，我前往香港参加纪念《今天》三十周年的有关活动。诗歌音乐晚会现场，北岛将两位《今天》“老人”邀请上台，表达了赞美和感谢。这一幕不禁令我感慨。《今天》不仅是作家、诗人的，也不仅是编辑同仁的，在很长的可以称之为岁月的时间里，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没有他们的默默贡献就不会有《今天》的一路走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由于面临的压力有异，有人曾以性命相搏，亦有人慷慨解囊，出钱出力都大有人在。这真是一本奇特的杂志，从油印打字到堂皇出版，从北京地下到欧洲一隅乃至大洋彼岸，最后落脚香港弹丸之地。参与者甚众，人员更迭频繁，改头换面、跨越时间。从文学革命开始到大概概念的文化批判，以至历史评述，从身处极权社会的异端到市场大潮下的中流砥柱……这里肯定有什么异常珍贵的东西，使一代乃至几代人为之努力牺牲，也值得为之努力牺牲。

讨论发言中我说道，“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期刊，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在此我想补充说明，所谓的强

硬的文学精神就是指其独立的品质。文学的独立性及其表达，在中国特殊的现实中不是一个概念，更非理论玄谈，即是坚持文学本体的必要、自由创造的可能。在各种强权或势力的干扰冲击下，在交往对垒中显现文学的本心本意和它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

2013. 3. 15